

温 柔 年 华^{*}

文 / 〔俄罗斯〕C. 索洛维约夫、. 索洛维约夫

译 / 胡 榕

军事精神科医生颤悠悠地走进来,在矿泉城医院的一间办公室里向我提问,而他自己也相当神经质地不时口吃着。

“必须要有内一内心的平静,放松并且相信。原则上,你相一相信我一我吗……”

“是的……”我表示同意。

“你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对于我们,就算它确实发生了,也并不那么可怕。无论如何,是可以恢复的。小震伤的后一后遗症微乎其微……怎么,你叫什么名字?……”

“您那儿都写着呢……”

“那能看出什一什么?例行公事是什么结果也没有的。我想让你当着我的面把一切都回忆一忆起来。重新。自己回忆。怎么样?……”

“好吧,我姓格罗莫夫,名叫伊凡……”

“父称呢?”

“安德烈也维奇……”

“父亲还健在?母亲呢?他们现在在哪儿?都做什么工作?”

“父亲是外交官。但是,不,甚至是间谍。热点问题专家。母亲是他的战友。西班牙学家。现在又都在古巴混日子呢……”

“为什么混一混日子?……”

“众所周知,世界革命的前景已经“盖棺定论”了。而父亲为了这个前景自觉地贡献了一生……”

“你父亲出身于什么样的阶层?家庭的社会环境很不错吧?”

“飞行员之家。我的祖父,就是爸爸的爸爸,曾和契加洛夫^①揭示了苏维埃——美利坚……就是说,第一批不着陆飞行抵达美国的飞行员。先是契加洛夫,然后是祖父。经过北极……后来祖父曾在那场真正的战

^{*} 译自俄罗斯《电影剧本》杂志2000年第2期,译文稍有删节。作者C. 索洛维约夫和. 索洛维约夫系一对父子。C. 索洛维约夫是俄罗斯著名导演。在几十年的导演生涯中,他始终关注青少年问题,他的青春三部曲《童年过后100天》、《游泳救护员》、《嫡系后裔》曾引起国际影坛广泛好评,并为中国电影人所熟知。《温柔年华》是他近年的又一力作。剧本作者以犀利的笔触提出了俄罗斯社会转型期严重的青少年问题。该片拍竣之后引起俄罗斯电影界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做为剧作者之一的. 索洛维约夫在其父C. 索洛维约夫执导的《温柔年华》中饰演男主人公。该片曾在2002年第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特别放映,受到高度评价。——编者

^① 契卡洛夫(1904-1938),苏联飞行员,苏联英雄(1936),曾完成莫斯科——北极——美国的不着路飞行。后因飞机事故遇难。——译者



争中战斗……”

“你把什么叫做真正的战争?”

“就是那场我们打胜了的战争。如果我们不取胜,那就是说,也许不值得,或者根本就没必要……”

“不对。我们继续……祖父在我们那场真正的战争中做了什么?”

“试验飞机……后来为把加加林送上太空作准备……首航之后,在那个年月奖给他们 10 辆特制的‘伏尔加’,发动机盖上有镀金的鹿……加加林的是 001 号,柯洛摩夫 002 号,季托夫 003 号,祖父的是 007……就像詹姆斯·邦德那样。但祖母不让我们那位真正的邦德坐在驾驶座上……担心他驾驶不了……不久前她还自己开车……她已经快 80 岁了……在那场真正的战争中,她驾着 4 翼飞机在空中轰炸德国人……跟女孩子们一起……她们那时都只有 18 岁,也许有个别人 20 岁……我的奶奶,大家都称赞,漂亮极了……”

“看,多棒的英雄家庭啊!而你的意识中却形成了某些令人遗憾的盲点。你有时能记起什么,一切都记得吗?……”

“是的。”

“那什一什么时候不记得?”

“令人厌恶的时刻:葡萄糖……黑暗和数字在跳跃……”

“什么数字?”

“各种各样的。基本上,我看,是 2 分。有时候还有音乐……”

实际上,这次谈话令我厌恶之极。最近

几天的事件之后,我已断然决定彻底病退。因此,我认真地把真理和谎言混为一谈,熟练地调制我非凡的记忆和严重的不省人事的鸡尾酒,以此折磨我那富于同情心的医生的神经。接着我又表现得极为专注、真诚、令人信服,绝对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行事。在口头描述了失忆“盲点”之后,我立即闭上眼睛,轻轻地皱了皱眉头,似乎在竭尽全力回忆着,我想,为此我的面部所呈现的应该是一副受苦受难的表情。

在我的头脑里,立即就相应地展现出群星闪烁的黑色深渊,而那些数字确实从深渊飘上来,经过我的头脑,在我的眼前飞舞。正如我所说,其中大多数是 2 分。

“停、停、停一止!”精神病医生立即向我喊叫起来,他自己也神经质得厉害,“没有我的命令,任何紧张过度的事也别做……你现在在想回忆什么?……”

“鬼知道。就这样。觉得挺有意思的,什么都无所谓。可是您看见了——没有……”

“在这个子弹箱倒在你身上之前,从来没有有什么盲点吧?”

“好像没有……而且我现在也还能很好

地回忆许多事呢……”

“你记起的东西,是有条理的吗?或者只是偶而的片断?例如,现在,你能回忆起童年的某些事吗?你是哪年出生的……”

9月1日祖父第一次亲自送我上学,把我和一套宇宙飞行服一起送给了学校。

“……我知道,你们永远也不可能忘记这一天——当你们听到第一声上课铃响起的那一天!因为我也永远不会忘记当我踏上对苏联不友好的美国领土时的感觉,那是我和同志们不顾一切地为了我们幅员辽阔的伟大祖国的荣誉,完成了苏维埃飞机首次降落在美国土地上的飞行!因此,即使在自己短暂生命的最后一刻,第一个宇宙上的地球人、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公民、我的年轻的朋友,尤里·阿历克赛耶维奇·加加林,当然也不会忘记飞向太空时失重的瞬间感觉。今天,我们,他的战友和朋友,把他的宇航服赠送给你们学校!……”

祖父对着麦克风喊叫着,他脖子上的青

筋突起,而9月的微风则轻轻地吹拂着他那稀疏的灰白的头发。“邦德”扶着弯曲着的橙黄色的宇航服的腰部,而与他并排的两个专门为此挑选出来的肥头大耳的,宽肩膀的十年级学生则从另一边和后面使宇航服保持直立。我们的“黑夜女巫”——祖母,用伏尔加轿车把我和祖父送向新生活,因此,她身着深蓝色带白色圆点的连衣裙、头戴草帽,显得有些紧张。她站在离祖父不远处,双眼因祖父的发言而激动得闪闪发亮。军乐队开始演奏,几乎在同一时刻,专门为这次隆重的仪式从莫斯科乐团请来的歌唱家张开双臂,唱道:“……他说——我们走吧,他挥了挥手……”

所有的人,其中双手抱着沉甸甸的一束香气逼人的天竺牡丹,双肩背着直挺挺的新的学生背包的我,簇拥在人群中,和谐地唱出和声:“就像沿着彼得堡大街小巷,在大地上飞翔……”

“真是加加林本人的宇航服吗?不会言



过其实吧?”

我看见那位军医开始对我时断时续的破碎的记忆感兴趣;不过我自己也认为,我感觉得到,这段记忆在眼前变成了令人兴奋的故事。

“嗯,我说过……还有他的加加林式的弹射装置……于是,学校里有了一个宇航纪念馆……在一楼……课余时间……玻璃罩里面……玻璃是特殊的……敲不碎……我们试过……休息时我们玩骑马游戏时试过……”

我的脑海里立刻涌现出难以忘怀的前所未见的中学里课间休息时的热闹场面。大家都穿着那时的学生装——男孩子都穿蓝色短上装,女孩子们则身着咖啡色的连衣裙,系着黑色的镶着荷叶边的围裙。他们和她们都戴着沾上墨水和粉笔灰的红领巾。

那天,我作为“骑手”站在“马”旁边。“马”和我都吆喝了一声,毫无顾忌地冲出人群。“骑手”催赶着“马”。那匹“马”是我的朋友阿·沙·萨列冬,他是一位很有名气的雕塑家的儿子。他大声狂笑,一路小跑着模仿野兽的步伐。突然,“骑手”低下头,把头靠在“马鬃”上。于是,那匹“马”就用尽全力把“骑手”的头撞到纪念馆的玻璃上。那一记撞击很可怕,玻璃弯了弯,但经受住了撞击,而加加林的宇航服和他的发射椅也几乎像在宇宙飞船里那样在玻璃后面颤动着。

“那时候,同意你延缓服兵一兵役与你头部受伤有关,就是这次学校里的骑马游戏?”

我感觉到,军医已些许掌握了我年轻时生活的某些资料。他首先针对我短暂履历中稍显混乱的内心世界。

“这也有可能。”我肯定地说,“虽然第一

次严重的创伤发生在早些时候,而且带些审美的性质。事情是这样的,在上学前不久我被带到大剧院看早场的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作为从前的英雄和老战士,祖父被安排在免费的院长包厢里……女巫当然和我们一起……我们还带莲娜一起去……”

“莲一莲娜是谁啊?”心理医生职业性地询问新的人物,他显得兴奋起来。看来这位精神病心理医生很感兴趣,然而,我却很文明地快速熄灭了他心理分析的热情。

“莲娜?什么莲娜?……我说了……莲娜吗?……”于是,温柔的乐曲又从我的无意识的记忆深处响起……

这是最有名的院长包厢。据说斯大林本人也曾在这里就坐。这个包厢恰恰在乐池里乐队打击乐器位置的上方。我生平第一次去大剧院。乐队继续着某个令人不安的乐曲。就在包厢下面,鼓手用顶端缠着棉布的槌子紧张地轻轻敲击定音鼓。伴着鼓声,鲁斯兰骑着一匹活生生的马从后台走出来,他身上挂着长马刀,向着正厅里的观众唱了起来。我俯身从包厢向乐池看,想要观察鼓手如何协调动作,但鼓手却把槌子放下,拿起铜钹,伸开双臂,准备进入一个很重要的时刻。邦德和女巫,还有那个满头卷发上扎着蝴蝶结的永远安安静静我的同龄女孩莲娜——我们都全神贯注地看着舞台上。莲娜是我父母好友的女儿。她的父母也是外交官,也同样在国外到处游逛。我们大家都兴致勃勃地看着台上。这时,鲁斯兰骑着马向后台走去,他拔出剑,穿着靴子的双脚踢着那匹瘦马的两肋(那匹马因此很委屈地倒在第一幕那俄罗斯帝国神圣版图的布景上),而鲁斯兰却对所发生的一切毫不在意,又唱了一会儿,骑着马持剑向着雾中

敌人的脑袋刺了过去。这时,那脑袋突然张开大嘴,而乐队则在这一段演奏得格外起劲。鲁斯兰全神贯注地继续愤怒地歌唱,他似乎要回应乐队,把剑伸进那个脑袋上的张开的大嘴。就在这时,在我的身下定音鼓手奏响了铜钹,发出了巨大的声响;而我在激动中因身体过份探出包厢,而很奇怪地从包厢里跌了出去。相对而言,包厢的位置并不很高,我可怜的脑袋恰恰碰撞在定音鼓的正中间,穿透绷紧的鼓面发出巨大的声响。掌声四起。

“我被从定音鼓中直接送上急救车,诊断为外伤性的神经问题……就是这个诊断成了我第一次延期服役的理由。后来,说真的,我自己就把这个诊断宣告无效了……提前宣告并且很不理智……但这已经是以后的事了……后来……”

芭蕾舞班的地板上被画上了整齐的金色的四方形:晚霞金色的光辉透过古老的落地窗射进房间。5个穿着天蓝色纱质多层芭蕾舞裙的女孩,双手扶着长长的扶杆,用脚尖站立着,和着音乐节拍,在镜子前反复地做着慢蹲和直立的动作。在阳光下——也许这只是我此刻的感觉——莲娜也慢慢地蹲下,而此时她的脸就缓缓地移出阳光,进入一片昏暗;但是后来,依照不时拍着手掌的教师的命令,她又开始渐渐直立,她的脸重又被莫斯科冬天神秘的晚霞照亮:携着飞舞着的灰尘的金色光线重又照在她的脸上,她的头发闪亮。我和奶奶坐在大厅的角落里,不知为什么,我看着这一切并不感到乏味。后来,教员慢慢地拍了一下手,一切都结束了。

有时候我们在楼梯口相见。有一次,她

就穿着那身天蓝色的多层芭蕾舞裙来见我。她在芭蕾舞裙上还披了一件很暖和的毛衣。

“我去冲一下淋浴,换换衣服!我很快,我是第一个,比谁都早!……”

“你站在这儿,”莲娜刚一消失在门后,奶奶就对我说,“我去把车发动一下……”

空荡荡的、回声很响的楼梯上只留下我一个人。远处有人在弹钢琴。不久琴声就止息了。四周静悄悄的,后来又听见某处有人在哈哈大笑。我像个梦游病患者似地突然迎着这笑声走去。我走在黄昏中昏暗的走廊里,后来又推开了一扇磨损得很破旧的门。全裸的莲娜背对着我站在门后。我立刻就明白了,这是莲娜。她正用长长的蓝色毛巾擦着身子。她的淡蓝色的多层芭蕾舞裙被放在身旁的地板上。落日的金色光线透过不很透明的玻璃折射到芭蕾舞裙上。又听到了某处的笑声,但是在这儿,在更衣室里,除了我们俩,谁也没有。莲娜没有尖叫,没有坐下,也没有躲到角落里。相反,以一种我不理解的平静,甚至是以某种奇怪的、因为非常激动反而显得淡漠的神情转身向着我,仍然没有用毛巾遮掩。

“你怎么,疯了?立即把门关上!”

我又瞧了她一眼,便像进来时那样悄无声息地走了出去。

街上仍然是冬天:黄色的太阳挂在天边,天际一片金黄,灰蓝的暮色依然浓重。“伏尔加”轿车窗外雪花飞舞。奶奶开车很灵活。我和莲娜坐在后座上,相互离得远远的,我们俩都紧靠自己那边的窗口,谁也不看谁。我们都看着窗外的泛着某种幽幽蓝光的银白色的莫斯科。一长列汽车装饰着气球、飘着彩带,从我们旁边驶过,我们鸣着汽笛超过他们。在一辆海鸥牌汽车的车盖

前方扎着一个穿着白纱裙的布娃娃。

“婚礼。”莲娜说。

“有意思，他们这是去哪儿？”我问。

“什么哪儿？餐厅呗……”莲娜回答。

“那就是说，这不是婚礼，”奶奶说，“婚礼不应该在餐厅里。婚礼应该在有银屋顶的金房子里……”

奶奶在厨房里煎肉。就像在地狱里似的，油在丝丝作响，浓烟四起。祖父在看电视。电视上有安德罗波夫的形象出现。

“他这是在整顿秩序。”祖父旁若无人似地自言自语地赞许着。

祖父冬季宽敞的住宅里暮色浓重，显得空荡荡的。昏暗中，一架钢琴在房间深处的一角幽幽闪亮。莲娜茫然地敲着琴键。我在走廊里向莲娜做了个手势。她不甚明了地悄悄走出房间问我：“什么事？”，而我则把手指放在唇上，意思是说，我请求她别出声。我轻轻地拉起她的手，把她带到住宅深处祖父的办公室里，当我们进去时，我仍然拉着莲娜的手，把她带到阳台的门旁，让她呆在那儿，我自己则回到房门那儿，两次检查了门锁上的钥匙。

“我还想看见你那样，”我哑着嗓子请求着。她立刻就明白了。

“你怎么，疯了？”她有些生气，又一次不以为然地逐字逐句重复了我在芭蕾学校听过的话。而她这种不以为然的平静再一次在我内心唤起某种疯狂的半昏迷似的激情。

“我请求你，求你了。”

她沉默片刻，然后微微地耸了耸肩膀。

“请转过身去……”

我转过身，听见了自己猛烈的心跳。

“伊凡……”她终于轻轻地唤了一声，我回转身来。

她全裸着站在阳台门旁，把脸转向我，双手恭顺地沿着细腰两侧垂下，她单薄的躯体那时在我看来像是非物质的、透明的。但不知是阳台上的，还是屋子里的晴朗冬日的暮色退尽，一切都慢慢浓缩了。在傍晚的天空中仍然飞舞着鹅毛大雪。雪幕后面克里姆林宫依稀可见，上面那颗红宝石五角星明亮地闪烁着，就像在旧明信片上那样。

于是，我像先前那样悄悄地走近她，不知为何我把双手放在背后，弯腰吻她的肩头。那肩头是冰凉的。

“瞧，你还是记得‘莲一娜’？童年的激情是意味深长的……”

“什么也不意味。在这个位置上，我的脑子里早已是一大堆数字了……”

“但是，总之，莲娜是谁？……你尽力回忆一下……”

“可是那没什么可回忆的。嗯，我们的父亲曾经一起在外语学院学习。外交大楼里我们两家的房子紧挨着。开始我俩还一起上小学。就这些……”

“完了？”口吃的医生不信任地追问着。

“嗯，有时，我坐女巫的车到舞蹈学校去接她。但是后来，她的父亲被派到法国工作，他们立即就把她带去了。她就在这个法兰西的某地消失得无影无踪……总之，我想，我们还是回到更重要的社会性问题有意义些。实际上，我从未能忘记过，我的童年恰逢冷战时代极其困难的国际环境……”

“开始计时？”

这个干活的人是军事教官谢苗·谢苗诺维奇·别斯巴里奇柯夫。他按了按秒表，秒针跑了起来。

在宽敞的、设备一流的建在地下掩体里

的学校靶场上,在一张没铺桌布的木制桌子上放着拆卸开的武器。桌旁站着我的好朋友阿·沙·萨列冬和过早发育的粗壮的傻姑娘娜奇卡·苏波尔多娃,他俩都穿着校服。娜奇卡是个留级生,和我一样,她也没戴红领巾。他俩依照军事教官的命令,蒙上眼睛限时组装武器。我们则应该站在一旁观看,并且考虑该站在谁一边,怎么为她捧场。谢苗·谢苗诺维奇因为激动和伤痛而颤抖不已(关于这些我以后详谈),他站在桌旁,目光从秒表移到考生身上,又从考生移向我们,然后又移向秒表。别斯巴里奇柯夫自己和参赛者都处于悬挂在比赛桌上方的台球桌灯那束强烈灯光的照射下。我们大家则在依稀的暮色中在不远处挤成一堆。有人还真傻乎乎地耷拉着下颌认真观看,有人则偷偷地用小手电筒照亮着看书,有人瞪着双眼看天花板,似乎在考虑自己的问题,还有人在窃笑着说悄悄话。我们的学校和课程都是混合的——男孩子们和女孩子们同去靶场军训。瓦齐克·尤金,一个蓝眼睛、黄头发,似乎充满幻想的男孩,专注又机械地嚼着纸片,他时不时地嚼完一片片从数学练习本上撕下的纸片。嚼到一定的数量时,尤金把一个闪闪发光的喇叭送到唇边,深深地吸了口气,瞄准后便用力把纸团从喇叭吹出去,准确地粘在苏波尔多娃蒙着布的额头上。

“啊——啊!……”娜奇卡用手掌拍着被打中的额头喊叫着,“轰”的一声倒向还没装配好的武器,“谢苗·谢苗诺维奇!这不诚实!我看不见,他们还捣蛋!……”

“立——正!”谢苗·谢苗诺维奇喊了起来,他的声音比娜奇卡的叫声更可怕,“离开尤金,向旁两步走!”别斯巴里奇柯夫命令道。大家立刻明白了,谢苗诺维奇已确定是尤金

所为。尤金孤独地站在似乎被隔离出来的空地上,一手拿着喇叭,一手拿着纸,“你怎么,尤金,是块石头,嗯?你怎么,尤金,成了彻头彻尾的怪物?!”

没等回答,谢苗·谢苗诺维奇便抓起一大串沉甸甸的钥匙,没有瞄准就用力向尤金头上砸去。尤金躲闪了一下,那串钥匙“轰隆”一声砸到了墙上,砸下好大一块墙皮。

“您怎么啦,谢苗·谢苗诺维奇?”尤金好不容易才镇静下来,恐惧万分地问老师,“您怎么,真是被震伤过的?如果真被砸中了呢?我怎么,因为这个苏波尔多娃就得终生残废?……”

“是的,尤金,是的!我对你说过,我受过震伤!很遗憾,这是一串国家给你们非常好的躲避原子弹的掩蔽部的钥匙,我没能用它砸中你,尤金!你完全不必再等着我来砸中你,致使你变成一个白痴,因为你已经是蠢货!因为只有像你这样并非货真价实的畸形人才会这样恬不知耻、这样不求甚解地对待你,尤金,和你那些智力不全的同学们明天将要生活其中的现实!而现实就是这样,你没有选择——不是你打死他,就是他打死你!我不止一次坦率地对你们讲过,我这些话意味着什么!我指的是美帝国主义!我在古巴见过他们,就像看见你们一样!我和他们作战,就像和你们一样,因为我很明白,我期待他们的是什么!而他们想要的,尤金,恰恰是你的愚蠢和你的那些装傻充愣的好朋友们的冷漠。首先,他们实际上想要的就是希特勒曾经妄想的!他们想要的是凌驾于世界的强权!他们想要统治全球!他们想用美元来操纵你们的意志!而且已经在操纵了——如果你们不反抗的话!这并不是你们从电视上听到的!也不是迫使你们看的《真理报》的政治新闻!这

是你们的苏联军队的军事教官对你们讲的，哪怕暂时还只是以防万一吧。这是我，谢苗·谢苗诺维奇·别斯巴里奇科夫在对你们讲。这一切都是我在古巴时用自己的双手触摸到的，”谢苗·谢苗诺维奇，像在舞台上那样，张开双臂，把两手在台球灯光下举得高高的，“是的，尤金，我是被震伤的！我受过脑震荡！因为他们在古巴一天中三次向我射击……但毕竟没打死我。但在这几次射击中我不只是受到震伤。正如他们所期待的那样，这几次枪击让我明白了许多。也恰恰因为这样，我才丝毫不感到良心有愧地穿着迷彩服就这样几天几夜地坐着，”谢苗·谢苗诺维奇轻轻地爬到桌子底下，摆出当时他的坐姿给我们看，“我就这么坐着监视，但不是在舒适的掩体里很合适的桌子下，而是酷热中躲在炎热的古巴棕榈树下，近处就是美军关塔摩军事基地，而下面就耸立着像钓鱼竿组成的树林一般的高压电网。我耐心地等待着，等着某个打哈欠的美国兵连喊叫一声都来不及就在我的眼前跌入我布置的、我祖国的工厂生产的精巧的电网。但这个值得夸奖的世界主人突然颤抖了一下，轻轻地地点着一束幽幽的蓝光，实际上他是在瞬间注意到了我在值勤结束时迎风吹落的一堆烟灰。就是这样……”谢苗·谢苗诺维奇向前伸着手，仔细地、并不使劲地吹着手掌。

大家都有些发呆似地沉默着。站在军事教官背后的萨列冬僵硬呆滞的模样尤其感人——他呆站着，像在仪仗队里似地提着差不多已经装配好的卡拉什尼科夫步枪。

“你们去问问与法西斯战斗过的人！去问问他们当时的感觉！他们明天就会到加林纪念馆来看我们，在那里，他将接见你们并最终接受超龄蠢蛋苏波尔多娃、叶夫多基莫娃和你，格罗莫夫加入少先队……”

想起了明天我将面临什么，在他的目光下我微微一颤。

“在那里你们向他们提出这个问题吧！而现在……萨列冬，把武器放在桌上！把我的眼睛蒙住！紧些！再紧些！起动秒表！”

萨列冬像机器人似地准确利索地完成了军事教官的全部命令。寂静中可以清晰地听见秒表的滴嗒声和军事教官“摸瞎”组装时金属部件的碰击声。

“完成。”别斯巴里奇科夫终于说道，秒表“咔嚓”一声停住了。

“10秒。”萨列冬惊喜地喊出了组装武器耗去的时间。

“站住！谁也不许动！”谢苗·谢苗诺维奇双眼仍蒙着布，在一片静默中站起来，把一夹子弹装入枪膛，原地转身，脸对着靶标那边，举枪上肩，向远处瞄准连射。

“萨列冬，把靶标拿来！”谢苗·谢苗诺维奇把蒙眼布取下，放下步枪。

萨列冬从台球桌下爬过去。我们都聚在四周。当萨列冬把靶标拿来时，我们都伸长脖子看着靶标。

“10环、又一个，几乎10环、9环、9环、9环、8环、8环、8环……”苏波尔多娃满怀敬意地低声读出别斯巴里奇科夫射中的靶环数。

“太棒了，”站在第一排的一个矮个子拍着手赞叹着。他比我们这些人中的最矮的人还矮一个脑袋。他的名字叫谢列加·缅尔基。

“为什么你们那位头部受过震伤的军事教官把你们称作‘超龄蠢蛋’？”

“他就是这样的。他这是指少先队组织。那时全班只有我们3个没被吸收入队。准确些说，苏波尔多娃和叶夫多基莫娃是因



为卖淫被开除的,而我呢,则是因为各方面都表现不好一直没被吸收。事情是这样的,从二年级开始,我就没答对过一道算术题。在数学方面我的脑子完全不管用。实践证明,这是与生俱来的缺陷……”

“你在说什么?这是哪一年——1984年?那时谁在克里姆—姆林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他们那个时代怎么可能有卖淫的?卖淫——这一这是体制崩溃的后遗症,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不利或者是他的背叛的后遗症……”

“别这么说。您所赞不绝口的体制早就开始溃烂了。在我们这里,在尤什卡,早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后,这就已经是时髦玩意儿了。一开始甚至不是为了钱,而是对自由的最肤浅的理解和内心欲望中二者必择其一的感受所致。苏波尔多娃和叶夫多基莫娃,她们,说真的,比我们年长许多,是老留级生了,是被执法部门在“你好”旅游中心抓获的,可是她们最初纯粹是出于体育锻炼的兴趣去那儿的。1984年,在尤什卡已经出

现了第一个车臣人……他叫阿斯兰……那些车臣人做起这一切来可真是专业水平。那些拉皮条的……”

“关—关于车臣人,我们以后再谈……那么,你最终被接受加入少先队了吗?”

“接受了。还能怎样!”

瓦齐克·尤金、阿·沙·萨列冬和我围坐在枝形吊灯下的午餐桌旁。我们几个的脑袋几乎都要碰到一起了。

缅尔基在陈述计划:

“我们在鸟市上买鸽子,小铝盒子我们今天就制作,在铝盒里严格地按照比例放好硫磺、镁、硝酸盐……行动的那一天,我们在报纸上放上米粒,鸽子会毫不迟疑地去啄米……盒子上先要焊上个夹子……鸽子啄米时,我们把它夹到鸽子的爪子上……连同铝盒一起……让鸽子的屁股顶着盒子盖,它会感到痛和不舒服,然后就飞起来了,开始在笼子里不安地狂飞,而盒子里那些配制好的火药就开始相互磨擦,铝盒因而变得很

热,灼烤着鸽子的屁股,鸽子发怒了,慢慢地变得狂躁……于是,一切便发生了……明白吗?……”

我们默默地点头。

后来我们制作铝盒,然后就数出火柴头,把硫磺放成一堆。谢列加戴着游泳用的眼镜很专业地在“咕嘟”作响地蒸馏瓶旁勤奋工作。当着我们的面制作出这次行动所必须的纯净产品……进行曲响起。

庄严的一天终于来临。鼓声。号角声。

“我,苏联少先队员,庄严宣誓……”

萨列冬把一张报纸举起来,尤金把米粒撒在上面。谢列加·缅尔基从怀里取出茫然无知的鸽子。

“我,苏联少先队员……”我又重复了一遍,苏波尔托娃和叶夫多基莫娃和我一样信誓旦旦。

鼓号再次齐鸣。祖父微微颤动着双手给我系上红领巾。旁边两位老军人则为苏波尔托娃和叶夫多基莫娃授巾,显然他们并不知道是在和谁打交道。

鸽子很配合我们的计划,开始啄报纸上的米粒。谢列加拿出用布包得很整齐的装好各种制剂的小铝盒。尤金用双手按住稍有反抗的鸽子,缅尔基把夹子夹到鸽子的爪子上。鸽子疼了。它开始在尤金的手中挣扎。

“别动,乖,别动。”尤金对鸽子喃喃低语,“我们这里暂时还一切正常,一切要按计划……”

“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祖父庄严地向苏波尔托娃、叶夫多基莫娃和我同时建议。

“时刻准备着!”我们齐声回答。

谢列加从走廊的暗处出来,站到亮处。

他装出一副往别处看的样子,偷偷地把在手中挣扎的鸽子放了。我看见疯狂的鸽子在天花板上狂飞乱舞,在空中越来越快地画出一个又一个虚拟的圆圈……“这是它被烫得慌”,我刚刚这么想,就听见:透过天真无邪的童声合唱传来了强盗般的哨声和某人的令人心悸的喊叫——

“卧倒!”

就在这一刻,鸽子的脑袋猛地撞上了加加林的玻璃。可怕的爆炸声。电灯熄灭。庄严仪式的所有参加者都卧倒在地,他们的身上浅满尚未完全震塌的纪念馆展台上的玻璃碎片。穿着宇航员服装的加加林在那张巨大的照片上依然微笑着,似乎他还不知道,他已经燃烧起来了。此刻,一条不太旺的火舌已经烧着他的宇航服的一条裤腿。那火舌好像是从加加林的宇航靴里蔓延开的……

“怎么这一这是你们的社会性反抗?”

“您说什么啊,上帝保佑您?怎么是反抗啊!纯粹是调皮捣蛋嘛!但是,自从加加林展台倒塌之后,好像我们大家的脑袋都给拧掉了,一切都可以沿街叫卖。大家突然一下子都明白了,旧的一切永远结束,任何人都可以为所欲为的时候到了……”

“你说一说什么?”

“我说:任何人可以做什么事……”

“什么‘任何事’?”

“哦!恰恰是这个问题最初谁也没有意识到。”

“你看,老爷子就这样把全国……”

我和萨列冬在许多手握锤子的工人塑像和列宁的半身头像中间走,这些塑像即使不算底座个头也有真人那么高……还有一

些骑在高头大马上的戴着头盔的俄罗斯骑士,身披斗篷的诗人的雕塑。他们好像在跳舞,他们的脚尖随着诗句旋转……他们那富于诗意地张开着的双臂给人以想像……

阿 沙用肩头撞了一下玻璃门,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布置精美的小客厅,它与一个绝妙的有玻璃屋顶的工作室相通。说真的,这个客厅不算宽敞,可是在它的一角还立着一尊巨大的骏马雕塑。桌子上摆放着4个人用的餐具。

“你好,未曾相识的青年一代!……”老萨列冬举着装有油炸鹅仔的托盘,就这样说着从另一扇门走进客厅。身着英国花呢套装、浅蓝色的衬衫、戴着领结的老萨列冬情绪颇佳,“请就坐!请坐吧!”

我和阿 沙就坐。阿 沙拿起餐巾,把它塞进衬衫的领口处。我看了看他,依此模仿。

“怎么样,我们的鹅仔熟了吗?”老萨列冬和蔼地问儿子。他拿起一把大刀,做出一个野兽般的表情,似乎在原始森林里连根拔树桩似地,开始把鹅切成几块。“哦,幸运儿!”阿 沙的爸爸时不时地看看我们,似乎下意识地不停地嘟囔着,“哦,如果青春岁月尚未逝去,如果老年时光还能允许,如果处在你们的位置,我会做些什么贡献?我真想拥有你们今天的年华!在这样美妙的青春岁月里,在青春的自由里吹拂着当今时代的风!珍惜它吧,我们祖国难得的自由!要爱护它啊,朋友们!”老萨列冬往高脚酒杯里给自己斟了酒,也给我们斟了一些,碰了一下杯子,但我们因为谦恭并没有举起自己的酒杯。“哦,为此,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关于索尔仁尼琴^①,当然,你们听说过?……而他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萨列冬的爸爸很轻巧地把一块块鹅肉放进我们的盘子,而最大

的一块则给了自己。他也立刻把餐巾塞进领口,开始用牙齿撕咬热乎乎的鹅肉,仍然继续着刚开始的话题,“多少诚实、高尚的人,我们中间的优秀份子,在移民村里受煎熬。在监狱里,在克格勃的刑讯室里,自由在磨难中逐渐临近。终于,在我们的大街上节日的歌声出人意料地欢唱起来。或者,就算暂时还不是节日吧,但已经是节日的前夕了,这是真的……我已经闻到了节日的气息……”他像狗似地撑大鼻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顺便问问,妈妈怎么样?”

阿 沙不很明白他意指什么,便含混不清地耸了耸肩。

“别让她生气,儿子。我已经把她得罪够了。爱护她吧。钱,我今天给你。不,要么,不是今天,还是明天吧。”阿 沙对这些话的反应只是默默地点头,礼貌地嚼着鹅肉。我也不无认真和忠诚地注视着阿 沙的爸爸。鹅肉的确很好吃。“你们面前有成

^① 索尔仁尼琴(1918—),俄罗斯作家,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同时在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函授班学习文学,同年应征入伍,因在给朋友的信中批评斯大林,于1945年被捕,被放逐到哈萨克斯坦。1967年被恢复名誉;同年,他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检查制”;1969年11月被苏联作协开除会籍。1970年因其“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缺少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瑞典皇家学院宣布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1974年2月苏联当局宣布逮捕索尔仁尼琴,并于次日将其驱逐出境。同年他领取诺贝尔奖,先定居瑞士,后移居美国。1974年美国政府授予他“美国政府荣誉公民”称号。1978年6月他在哈佛接受学位时发表讲话,批评西方社会的实利主义和自由主义,引起一场争论。索尔仁尼琴通过政治活动和文学创作,表现出反对共产主义的立场。他主张“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建立“古老的俄罗斯生活方式”,1989年苏联出版他的《古拉格群岛》。苏联解体后,他回到俄罗斯。——译者

千条路。”老萨列冬继续着，“整个世界，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整个世界是彻底关闭的。而你们，请吧，选择吧，生活吧，创造吧……可以在这儿，也可以去檀香山，去纽约……你妈妈给我讲过你们班学生的家长们，我真吃惊啊！外交官、语言学家、麻醉学教授、翻译家……她说，还有一个人的爸爸用高压氧舱治好了心肌梗塞……真不错啊！……而这些人却曾是在专制和侮辱人的极权主义时代，用黑面包充饥的人们啊！……那么你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阳光下，在和畅的春风中？……你们的全部问题只是——找准航向、扬起风帆……前进……”老萨列冬吸了吸最后一根鹅骨头，把它扔在盘子里，又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酒一饮而尽，甚至没有做出碰杯的样子，然后他用餐巾抹了抹嘴唇，把它扔在桌子上，走到书架前，拿出一卷书。在我看来他是很随意的。他打开念了起来，看得出他是胡乱念的——

“我的心灵——是影的厄吕西翁^① 那些无言的、明亮的、美妙的影子……”他微带鼻音，似乎在用鼻子说话。萨列冬的爸爸微微拖长了声音继续念，“我的心灵——影的厄吕西翁……你们感觉到了吗？……奇迹！丘特切夫^②！……哦，这是什么样的奇迹啊！‘我的心灵——影的厄吕西翁’给你，阿历克赛，10卢布，零用吧。你们走的时候，照例把工作室的锁全都锁上……你知道钥匙在哪儿。我早晨之前不回来了……”他向我们告别，然后便离开了。

“什么是厄吕西翁？”沉默了一会儿，我向萨列冬请教。

“你脑子里别装这些怪东西，”萨列冬说着把10卢布装进口袋，“无论是丘特切夫还是尤特切夫，”他把没动过的食品放入一个

盘子里，并无恶意地继续说，“冰山不冰山的，索尔仁尼琴还是什么其他人……全都莫名其妙……”他把一瓶喝剩的酒和两个大高脚杯塞到我手里，“我们走吧……”

我们走过阿沙的怪爸爸那间装有许多丑八怪的工作室，沿着一个铁楼梯往上爬。

“注意，别犯晕！”萨列冬在楼梯口提醒我。他用一串钥匙中的一把打开了楼梯上方天花板下的一扇小门。

我们走进。这是一间很平民化的明亮小屋。好像是盥洗室，又好像是更衣室。里面摆放着花纹繁杂的洗脸池，画有中国风景的屏风，和一个磨损了的皮质卧榻。想像得到吗——娜奇卡·苏波尔多娃手里拿着一本打开的书坐在卧榻上。

“放心”萨列冬向她解释我的出现，“我们是一伙的。”

娜奇卡连眉毛都没抬一下。

“在看什么呢，苏波尔多娃？”我坐在她身旁问道。娜奇卡没有回答。这时萨列冬把装有食品的盘子、酒瓶和大高脚酒杯放在她面前的小桌上，斟上酒。

“我和她一起过，”萨列冬向我解释，“非宗教式的婚姻。她被家里赶了出来，因为行为不端，总不至于让她夜宿车站吧？……”

苏波尔多娃无所谓地与我碰了杯，然后又与萨列冬碰了杯，喝了一口酒，开始吃鹅。

① 厄吕西翁系指古代神话中的极乐世界、乐土、天堂。——译者

② 丘特切夫(1803—1873)，俄国诗人，倾向泛斯拉夫主义。他的哲理诗表达了对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产生矛盾的悲剧感，也反映了诗人的惶惑心情。他的作品以深刻的心理分析见长，也是抒情风景诗大师。——译者

“听过吗? ……”萨列冬问我,他递给我一个唱片套。在黑色的、绸缎般光滑的套面上画着几个非人类打扮的吉他手。他们穿着黑色的、缀着金属铆钉的服装,手里的吉他式样也是我从未见过的:是镶有珠母的、上过漆的那种。他们的头上流光溢彩,金色的灯光描出“KISS”这个词的字样。

“没有,”我老实回答,“从未听过。”

“现在你就能听到,”萨列冬把唱片放在唱机上,苏波尔多娃立即就令人难以置信地翻起了白眼,同时又似乎很兴奋地瞄着自己的鼻头,然而并没有停止咀嚼。萨列冬梦游似地摇晃着,在原地慢慢地踏出舞步,转过身,臀部向着我们,双手扶着墙,和着音乐的节拍,开始迟钝地用头撞墙并发出声响。

“你们理解了?”在音乐间隙他问我们,但他始终未转过身来面对我们,“这可不是丘特切夫……你们明白吗? ……”

我明白,我喜欢。

能震落牙齿的音乐继续着。但现在只有萨列冬听得见。阿·沙正靠在白色的瓷砖墙上,戴着耳机。这是学校男生宿舍3层楼的大厕所里的一面墙。现在厕所里已经人满为患,就像在首映式时的演员休息室里似的。当然,除了某些年轻的、不要脸的家伙,基本上谁也不用这个厕所。普通的、非俱乐部的厕所在2楼和4楼。在我们的厕所里有一种活跃的气氛——有人在变戏法、有人用口香糖换避孕套,有人在窗台上玩牌。所有的角落都烟雾腾腾,大家讲着下流的笑话,还吓人地哈哈大笑。但是,除了音乐,萨列冬听不到任何声音。我走到他面前,幼稚地想开导他。我觉得,对我们俩来讲,这很重要,为了说服他我还挥了挥手。萨列冬对我的话的反应只是摇了摇头,似乎表示同意我所说的一切;我因此而更加激动

更加起劲地做着手势。这时萨列冬吼叫起来,我立即沉默了。

“你明白吗,这是多么天才的发明?”萨列冬指着自己耳朵上戴着的耳机,“你想对我做什么都行,而我——一笔勾销……任何力量都不行,如果我不想要,你没法掰开我的脑袋……你没有力量加重我的负担……你说,我想的办法多聪明,嗯? ……”

我抓住耳机柄,把它扯下来。音乐声混杂着厕所里的喧闹声。

“你吼叫什么?”我问萨列冬。

“我难道吼叫了吗?”萨列冬惊奇地问道,“请原谅,老兄……你知道,有人提醒过我……这是强震反应……”

“改革开始不久,这个厕所便真正成了我们的适应中心。我们在那里适应新潮流、新生活、适应市场经济、公开性和民主化。先是适应有胎记的戈尔巴乔夫,然后适应暴徒叶利钦。他像我似的开始时从桥上跌到河里摔得很疼,等到身上的水干了,他又开始主宰我们的一切。新闻从我们耳旁一条又一条地呼啸而过,没有一个人想向我们解释哪怕其中的一条。而在我们的那个大厕所里则尽力相互解释着这些新闻。但是,最大的、最重要的、无可争辩的新闻不是加加林,也不是‘邦德’那英雄主义的极地飞行,而是女人们、白菜、绿色蔬菜……这些东西你拥有得越多,就越伟大,越聪明……而总统,我们设想,他就是我们之中那个最重要、最伟大、最聪明的人——就是那个善于把我们大家的绿色蔬菜都据为己有的那位……当然,这样重要的机缘,我甚至可以说,任何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都替代不了……”

心理医生有些不信任地看了我一眼,但他还是认真听着,没有打断我。而我则继续

起劲地斜着眼描绘着连自己都未能预见的
隐晦曲折……

在化学办公室里有4张桌子。那天我们3个人——缪尔基、萨列冬和我——围坐在放着一堆玻璃蒸馏瓶的一张桌旁。浅色头发的美男子达加也夫不知什么时候也来了,他是第4个。这是一个善良、真诚的小伙子。不知为什么他那天被冻得够呛。

那天的化学课从意外的惊喜开始。我们的副校长,外号叫“血红蛋白”的并不很老的历史学家带来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乳房丰满的姑娘。副校长留着大胡子,卷发从开始变秃的头顶向两旁分开。他把长有一双矢车菊样的眼睛的浅黄头发的姑娘一直领到门捷列夫元素表下。

“你们的化学老师伊凡·伊凡诺维奇退休了……”“血红蛋白”很平静地通知我们。

“嗯——嗯——嗯……”大家齐声嘟哝着作为回答。伊凡·伊凡诺维奇,我们,可以说,很爱他。但是这样说已经晚了些——

“别嚷嚷!”“血红蛋白”严厉地打断我们,“以后的化学课将由斯维特兰娜·瓦莲京诺夫娜执教……”

浅黄头发的姑娘有些害羞似地红了脸,她甚至想弯腰致意,但她及时地把握住自己。

“你们好!”新教师问候我们。

“请你们爱她、关照她,”“血红蛋白”结束了专门介绍,把我们的班交给新的化学教师后就走出教室。斯维特兰娜·瓦莲京诺夫娜把班放在桌上。

“我想,我们首先需要做一个小测验,”她说,“根据结果我才能客观地认识你们各位……”

“谁是谁……”达加也夫大声附和。

“是的,”化学老师并不在意,“请把钢笔和练习本拿出来……”她转身向着黑板,拿起一支粉笔,开始书写一个长长的公式。

“听我说,”达加也夫毫无恶意地,甚至稍带温柔地悄悄说,“你看看,她的颈项,啊?多么美啊!简直绝了!……”

斯维特兰娜·瓦连京诺夫娜继续写着。她的板书从黑板上方开始,举着粉笔的手抬得高高的,因此她的连衣裙被微微撩起,贴上了她那健美的小腿,显示出那着实令人遐想的丰满而可爱的臀部的线条。顺便说一句,说实话,我那时对此还不甚了了。

“想不想我给她来一个性休克?……”达加也夫建议,“想不想我现在就脱光了?”

“全裸?……”我吃惊地问。

“就全裸……打赌?……3卢布……”

“行啊……”我饶有兴味地表示同意。

我俩击掌成交。

毫无察觉的斯维特兰娜继续着她的板书。

达加也夫已经把套头衫和背心脱下,然后他脱了袜子,迟疑片刻后把内裤也脱了。

“完成,”达加也夫赤裸裸地坐在桌后说,“给3卢布吧。”

“可是性休克在哪儿啊?”我反驳道,“你站起来,就休克了。”

“可不是这么谈妥的,但是我可以站起来……”达加也夫想了想,“要5个……”

“什么?”

“5卢布……”

“成交……”我说。

达加也夫挺了挺身子,站了起来,把双手握成小船状盖住下部,起先大家齐声“啊?”了一下,然后就几乎像集体虚脱了似地沉入了可怕的、不祥的寂静。如此不祥的寂静连新化学老师都突然听到了,她转过身

来……

“您怎么啦？”看着全裸的达加也夫，还没完全明白出了什么事，斯维特兰娜·瓦连京诺夫娜问道。

“没什么，”达加也夫平静地回答，“很热。也许因为天气的缘故——酷暑……也许，就是因为激动。因为您来教我们……”

斯维特兰娜迟疑了片刻，想要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深深地吸了口气，微微闭上了她那双美丽的蓝眼睛，后来，很奇怪地，像是断断续续地惊叹了一声，突然头碰地板猛地摔倒了。她昏了过去。全班学生都颇为同情地围着她。一个女孩子用量杯装了水，洒在她脸上。

“应该把她抬到医务室去……”有人阴沉沉地说了一句。大家一起抬起她的躯体，并用脚推开门，把她抬了出去。达加也夫这时已经不慌不忙地穿上长裤，但他并没有挤进入群。他光着脚，上半身仍裸露着原地站着。而我和谢列加·缅尔基、萨列冬也没加入把斯维特兰娜抬出去的一群——应该说，我们都惊呆了，站在达加也夫旁边。

“如果她能活过来，我就成恶棍了——‘啪’地一声把她结果了……”达加也夫低声对我们许诺，可是我们大家不知为何觉得所发生的一切已经足够，所以谁也没有对他作出应答。

第二天理所当然地举行了教委会。

“如果我们大家现在就扔给你3卢布，你怎么样？你也当我们大家的面脱光了？”盖莫克洛宾向着达加也夫喊叫，让人难以忍受地翻着白眼。

“你们扔吧，我立刻就脱。”达加也夫贪婪地回答。

这回答实在出人意料。至少这个问题

并不期待这样的答案。

“就让我当着你们大家的面——他的耳光吧。”一阵沉默过后，军事教官真诚地对聚集在一起的人说。

“好吧，”达加也夫表示赞同，“这是教育嘛！……”

“谢苗·谢苗诺维奇，可这毕竟是教委会啊，我请您在与会者面前把握住自己……”校长竭力掩盖又一轮的尴尬。

“但是，请您同意，这一切确实不能允许，”一位低年级女教师叹了口气说，“他是头野兽。”

“不，我不是野兽，”达加也夫对她说，“只是改革使我们大家在物质上都陷入贫困，使我，也使您。如果您还不明白这一点，那么明天您就会明白的。但已经晚了。而今天，我不知道，对于您怎么样，但是对于我，对于我的家庭，3卢布已经是一笔大钱了……”

达加也夫在撒谎。他的父亲是一家大医院的总麻醉师。可此刻大家似乎都忘记了这个事实。

“极其令人反感的蛊惑宣传，”在大家稍作思考之后，盖莫克洛宾对达加也夫的回答作出严厉的反驳，“而且，从种种迹象看，他几乎是衣食无忧的。事态已经发展到颓废的地步；不久前，在我的历史课上，达加也夫说不出任何一个十二月党人的名字。我说的是实话吗，达加也夫？……”

“是实话，”达加也夫证实，“可他们关我什么事？……”

“这也是彻头彻尾的颓废。现在，达加也夫，到走廊里去，但别走得太远。我们立即就商量一下，作出决定，然后，再叫你回来……”

在学校傍晚阴暗、空落的走廊里，我们

坐在那里,不由自主地感受达加也夫恶作剧的气氛。当达加也夫出来后,我们和他一起,像一群受委屈的小男孩似地向楼梯走去。

“有没有抽的?”达加也夫问。

“要不,别抽了?……会加重处罚?……”
 缅尔基表示担心。

“我说了,给吧……”

达加也夫抽起烟来。

“违法?”我感兴趣地问他。

“那还用说!等着瞧!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自己就都违法了?他们知道这一点?弗拉基米尔·鲍里索维奇通过自己人已经跟他们谈过了……”

“谁是弗拉基米尔·鲍里索维奇?”尤金小心翼翼地问。

“谁该是一谁就是弗拉基米尔·鲍里索维奇,”达加也夫阴沉沉地回答,“一个匪徒,我姐姐的丈夫。索尔恩采沃人。实际上,整个尤什卡地区都在他的掌心里……”

“达加也夫!”盖莫克洛宾在黑暗的走廊里叫着。

达加也夫把烟头交给缅尔基后立刻往回走。

教员办公室里一切都没变。大家都沉着脸各自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是这样的,达加也夫,我们向你提出最后一次警告,如果这也不管用,那我们就把你开除了事。不,我们把你所有的作为放进一个文件包送往执法部门。接下来,只有在流放地才能确保你成为一个正常人。你弄明白了吗,达加也夫?”

“我很明白,”达加也夫毫无表情地重复着,“谢谢你们。我不会使你们失望的……你们还不了解我……你们可以相信我……我不会辜负……”达加也夫用浑浊的、不高

兴的目光扫视着这群教师,但仍然竭力避免与军事教官的目光相遇。

“嗯,还有,达加也夫,”当一切看来似乎已经结束时,政委说,“你必须找机会委婉地向斯维特兰娜·瓦莲京诺夫娜道歉。她是个年轻的教育工作者,你的愚蠢的、令人厌恶的流氓行为极大地伤害了她。她甚至拒绝到我们这儿来讨论所发生的一切。为你感到的羞耻折磨着她。我想,你已经理解了我的意思?……”

于是,达加也夫又一次向着这个教师集体点了点他那颗似乎理解了一切的、漂亮年轻的、长着一头浅色头发的脑袋。

……第二天,在课间休息时,达加也夫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地在厕所的窗台上打牌。这时有一个长得有些像东方人的八年级男孩子走来加入我们一伙。

“认识一下吧,他叫‘美臀’。”达加也夫向我介绍。

“波戈杜洛夫,”“美臀”补充说明,向我伸出像铲子似的大手,“我叫阿纳斯塔斯。”

达加也夫输了。不远处,萨列冬正闭着双眼沉醉于耳机里的音乐之中。社交活动还在积极地进行着。我还没来得及打个喷嚏,大家又玩起5点纸牌。

“你已经13了,”达加也夫快速计算着,“快追吧……”

“不吉利的13……”“美臀”强调了一句。

“今天我可没有……”我耸了耸肩说。

“不谈这个……”达加也夫严厉地说。

这时铃声响了。

“如果家里没有钱,就把笤帚挂上墙。”
 波戈杜洛夫善意地说。

“我明天带来。”还不知能指望什么,我就作了这个承诺。

“如果不带来——就得干活。”达加也夫说,“斯塔希克,摩托车还在原地吗?”

“也许吧,也许还在那儿,如果没被雪埋住的话……已经下了两天雪了……”

我们大家都向窗外望去。院子里的雪确实已经很厚很厚了。

这时门开了。盖莫克洛宾像主人似地走进我们的茅厕——

“你们怎么,没听见铃声?快点,快回教室……库兹亚金,你又抽烟了?……喂,把它熄灭!……”

这群人眼见着就散了。

“达加也夫,你道歉了吗?”盖莫克洛宾似乎很信任地问道。

“我们还没上化学课呢……”

“这与课程表有什么相干?我们已经说好了——你轻声地、委婉地当面向斯维特兰娜·瓦连京诺夫娜道歉,最好没人看见。就这样,比方说,我知道,她上完课一般在办公室,独自工作。给你们准备新试剂……”

达加也夫友好地向盖莫克洛宾点点头表示同意。在走廊的岔口我们与盖莫克洛宾平静地分手,走向不同方向,而“美臀”则走向自己的教室。我和达加也夫向另一方向走去。

“我们赌 25 卢布怎么样——我让她‘咚’地一声跌倒在地……”

“我没那么多钱。”我老实地说。

“真是个傻瓜。现在恰恰是时候——只有傻瓜才没钱。得了,老天惩罚。我就让她这样做给你看,不要钱……只追求欲望得到满足……只是你得做见证人……”

我很惭愧。但我克制不了。与达加也夫谈妥后,我就往他进入化学教研室以后特意给我留的门缝里看。我亲眼见到了许多事,如果没看见,那也听到了,就是说,我还

偷听了。当然,我很惭愧,但我很感兴趣:如果一切真是那样,那就是说,那个令人惊奇的、所有的人都可以为所欲为的时代真的到来了?……

“对不起,我从这儿走过——看见了灯光……”化学教师被达加也夫的出现惊呆了。她纹丝不动地默默地看着他。

“我很惭愧,”达加也夫用某种不自然的、温柔的、低低的嗓音继续说着,并且直直地注视着她的眼睛,仿佛在施催眠术似地,“我自己也不知道,对所发生的一切,我会有这样的念头。我特地找您,为了道歉。您知道,也许,所有这一切都是某种深藏内心的,连自己也不清楚的某种反叛情感表达。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大家都很热爱突然退休的伊凡·伊凡诺维奇。他是个很有意思的人。问题在于,他从心里仇恨我们大家,而我们也了解这一点,而且我们也很喜欢这样,”达加也夫咧开嘴笑了,而斯维特兰娜因为某种奇怪的暗示也对他报以某种极其微弱的、意味深长的微笑,“而当我们各自回家后,”达加也夫小心翼翼地扩大成绩,“伊凡·伊凡诺维奇,正如您一样,喜欢独自一人留在这里。他很孤独,实际上他无处可去,于是,他从琴盒里取出小提琴,是的,是的,您别奇怪,是小提琴,来回踱着步拉起了琴。然后他打开这个箱子,能不能请您稍等一会?”达加也夫俯身向着教师办公的大桌上的箱子,而斯维特兰娜顺从地背靠着黑板站了起来。达加也夫真的打开了箱子,“您看,这里总有酒精瓶……现在它们都还空着呢。想知道为什么吗?这是因为,他拿起三四个酒精瓶,把里面的液体倒进一个量杯里喝,喝完了又开始拉琴,”达加也夫挺直身子,他的脸与她的离得很近,“……我怎么会知道

这一切的?”达加也夫几乎是悄悄低语着继续他的故事,“我这就说。有时我和他一起喝,后来我听说,他是怎样拉琴的……”她的眼睛与正眨巴着的达加也夫的眼睛离得那么近,“您是多么……”达加也夫喃喃低语着把手放在她的臀部,并使劲吻她的双唇。

“达加也夫,您在干什么?”当达加也夫的嘴离开她那立时变干了的双唇时,女化学教师惊恐万状喘息着问。

达加也夫伸手“啪”地一声按了开关,熄灭了教研室里的灯光。

“哦,您是多么……”我又一次听到了已经从黑暗中传来的压抑着的达加也夫的声音。

“格罗莫夫,”提着拖把的女清洁工喊了我一声,“这时候你怎么还在闲达?……”

“我?……”我愣愣地反问毫无察觉的女清洁工,并把额头的冷汗擦去,“我得把化学课上的硝酸盐实验重做……”

“噢……”清洁工说着,用抹布擦了地板,然后便消失在走廊的拐角处。我继续站在那儿,背靠着教研室的门。敢情,我现在是给他俩的约会当警卫呢。我的背后起先默然无声,随后我听到近处有什么东西倒了,玻璃碎片散了一地。

“钱带来了?”达加也夫第二天在更衣室问我。

“对不起,我今天没法……”我无精打彩地说。

“那你得干活,我说过的,”达加也夫严厉地说着递给我一把螺丝刀,“这是螺丝刀,”他像对待一个低能儿似地对我说,“这样——它是一般的,这样——是十字型的,”他左一下,右一下地在我眼前晃动着螺丝刀,“根据情况可以变换着用……”

“美臀”身着污渍斑斑的皮衣站在一旁。显然他们是在等我……

从一旁观察,这里颇像开放的、连锁式的、现今的摩托车修理店。可爱的“美臀”站在旁边,抽着烟,不时地四下观望,手里还握着一辆儿童雪橇的拖绳。这是个下雪天,雪花纷纷扬扬。四周的一切都很明朗,好像波戈杜洛夫只是带着弟弟或妹妹出来散步,而他或者她正在雪地的另一边玩耍。事情发生在多层楼群的一座楼旁。我蹲在一辆“本田”摩托车旁,用达加也夫的螺丝刀拆卸摩托车上的马达。这是一辆崭新的摩托,很漂亮,不知它的主人是谁。达加也夫双手插在裤袋里站在一旁,不时地提些建议,但还摆出一副一旦有事却与他不相干的样子。

当我把马达拆下,用一只手托着它,马上就要把它放到地上时,可爱的“美臀”好像散步经过这儿似地把雪橇拉到摩托车前。我和达加也夫一起把马达搬上雪橇。

马达很沉。我们拖着它在雪地上蹒跚前行,颇像画家彼得洛夫的那幅“三套车”。雪继续下着,孩子们令人不可思议地吵嚷着在四周玩耍。孩子们推着湿漉漉的雪球,想堆一个雪婆婆。一个穿尉官服的民警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

“拉的是什么?”尉官问道。

“马达。”可爱的“美臀”顺从地如实回答。

“去哪儿?”

“去修理……”达加也夫的回答不出所料。

“请跟我来。”尉官说。

接着我们便一起走了。看来也不必走太远。

“你的大衣多奇怪啊。”尉官不再看手里

的纸,抬起头对波戈杜洛夫说。

“这不是大衣。”“美臀”自尊地回答,“这是皮氈,母牛皮的。”

“明白了,”尉官说着突然对着我问,“那么,是你拆了马达?……”

“是我。”我说。

“在这儿签个字,”尉官说着递给我一支圆珠笔。我接过笔。

“你怎么——真是傻瓜,”达加也夫用平常的声音说,“什么也别签。”

我看了看达加也夫,放下笔。

“你不想签?”尉官问我。

“不。”我肯定地说。

“好吧,”尉官说着从手腕上取下手表,

“那么,到这儿来……”

我站起来,按尉官的吩咐走过去。

他像战士看虱子似地看了我一会儿。

“说,你几岁了?”他又问我。

“14岁……”我回答。

“满14岁了?”

“满了……”

“好,”尉官好像在夸我似的,“温柔年华,”说完,他突然用令人可怕的力量使劲抽了我一记耳光。应该说,他打人很拿手。随着他手掌落下,我的脑袋里便“嗡”地一下,我被打翻在路旁。我站不起来了。

当我爬起来时,我感觉到脸上挨过耳光的地方像枕头似地鼓了起来,而一股湿漉漉的东西从嘴角流下。我用手抹抹嘴唇,手上有血。

“拿手帕擦了。”尉官建议。

“我没有手帕……”我说。

“那就舔掉它,”尉官建议。我把血舔了。

“现在该轮到你了?”尉官问达加也夫,而他则目光稍显呆滞地默默地站着,“轮到

你了。但你可以躲过去,我也可以把报告撕了。我觉得你们是聪明人,是很明白事理的孩子们,我们总是能谈妥的……”

“我们可以谈妥。”“美臀”立即随声应和。

“很好,”尉官说,“你们之中谁会开车?”

“我,”我说着,用舌头舔着肿起来的双唇的内壁,“从我5岁起祖父就教我开‘伏尔加’了……”

“开得怎么样?”尉官审视着我,严厉地问。

“他开得不错,但谢列加·缅尔基开得特棒,”达加也夫回忆着,“他是我们的密友。他简直是超人,是天才……”

“他也是……明白事理的?”尉官问。

“Yes,”可爱的“美臀”用英语回答,但从波戈杜洛夫脸上的表情尉官明白,这意味着“是的。”

“那么,今天就到此为止。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吧,”尉官说着把报告撕碎扔了,“你们有问题吗?”

大家都沉默不语。

“有,”我轻抚着被打肿了的脸问,“您知道什么是极乐世界吗?”

“不,”尉官回答,“我不知道什么是极乐世界。我也建议你只须了解与现实生活有关的东西。”

我俩坐在萨列冬父亲的客厅里,用叉子把平底锅里的鸡蛋拨来拨去,与此同时,萨列冬像往常那样戴着耳机颤动着身子,而我在读丘特切夫的诗集。说实话,什么叫——读?我已经说得过火了。我在信口开河。

于是,我像老萨列冬那样随意翻开一页:

犹如烟柱在高处闪亮!……

犹如暗影飘忽不定! ……

“这是我们的生活”——你对我低语——

并非淡淡的烟雾,因月光而明亮,
而是暗影,在逃离烟雾……

我合上书,把耳机的一端从萨列冬的耳朵上摘下来。

“你爸爸什么字典都没有?”

“你自己去看吧。我不用字典,所以不知道……”

我走到书架前,把丘特切夫的诗集放回原处,手指在一排书脊上摸过。没有字典。

“你要干嘛?”

“就是想知道什么是极乐世界?……”

“你已经问过了——但我不了解……也不用问娜佳。……娜奇卡生活中感兴趣的完全是另一些东西……”

“她怎么,又在这儿啦?”

“我都对你说了,我和她一起过。正常的、积极的性生活和非宗教的婚姻。建议你也找一个长期的。临时关系,瓦尼亚,在我们这个时代是没有好结果的……”

“我对此一窍不通,总之,我什么样的关系都没有……”

听了我的话,萨列冬不知为何呆住了,甚至把耳机也摘了下来。

“是吗?你怎么,兄弟,至今还是个童男?这可不好,这真是不怎么样。真是不合适。那么,好吧,我和娜佳现在就这个问题和你谈谈……”

过了一会儿,真的才一小会儿,我们走进萨列冬家楼上那间明亮的小屋。娜奇卡躺在卧式沙发上,还是在那儿看书。

“好哇,”我对她说,尽量表现得放松些,

说着便坐在卧榻边上。娜奇卡没有回答。我从卧榻这边望去,看见娜佳看的那本书的书名是《怎样领导种马铃薯》。

萨列冬坐在卧榻的另一边。他沉默了一会儿,后来不知为什么用手帕大声地擤鼻涕,然后就在娜佳的耳边低声说些什么,还不时地用眼睛瞄我。

“犯傻呀,怎么的?”当萨列冬停止了喃喃低语,娜佳问道。她有些莫名地不安,不知是因为害羞,还是因为激动——娜奇卡甚至把那本“领导土豆”的书都搁在一旁了。

“我们都是人,都是活人。”萨列冬看着远处客观地说,叹了口气,又擤了鼻涕,然后就走了。是的,在门口他解救似地回过身说:“娜杰日达,希望全在你身上了……”他嘟哝了一句,“就这样吧,娜佳,嗯?……”

娜佳稍显不安,我以前从未见过她这样。她耸了耸肩作为回答,这个动作,并不意味着拒绝或者同意……

“等一等,”我叫住萨列冬并跟着他走到楼梯旁,“你有避孕套吗?……”

“老头儿,你不用担心什么……就像上麻醉药一样,一切都会过去的……相信我,娜奇卡是这门科学的伟大院士……”

萨列冬拍拍我的双肩,把我推到玻璃门后。

当我回到客厅时,萨列冬正双腿搁在桌子上听音乐呢,同时还翻看一本金光闪闪的CD盘的目录。

“怎么样?”他看见我便摘下耳机,友好地微微一笑,“可以祝贺我们了吧?”

我什么也没回答就坐在他身旁,因为害羞我也把双脚搁在桌上。

“喂,怎么样?怎么进行的?”

“没什么……我看,正常……只是有些

痒酥酥的……”

“怎么痒酥酥的?”萨列冬突然害怕地问,“总之,你完成了吧?”

“好像是……”

“好像,还是,是的?”

“娜奇卡说,是的……”

“要是娜奇卡说了——那就是了……”

萨列冬立刻就放心了。他又戴上了耳机。

在楼上那间明亮的小屋里娜佳继续着被打断的有关“领导马铃薯”的阅读,这回她是仰天躺着读的。

在军事掩体里,军事教官谢苗·谢苗诺维奇站在我们面前。

“完了,”军事教官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它不知为何被轻率地称为冷战,已经结束了。我们错过了……”

他的双眼饱含着泪水。

“你们不再需要我了,我将离开……把我跟你们说过的一切都忘了吧。记住这些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用处,因为已经晚了。一切都太晚了。也许,你们想知道,我个人对这一切的感受如何?……”

“我们想知道。”在一阵严肃的沉默之后,谢列加·缅尔基说。

“很好,”谢苗·谢苗诺维奇说着走到桌子旁,那儿像基座似地堆着一摞摞砖,“我曾经向你们演示过我们,年轻的特种兵战士们曾经做过的操练。每个人,毫无例外,都必须用手掌把一摞砖块齐刷刷劈成两半。请记住,要这样……”于是,别斯巴里奇科夫张着大嘴,他已经要喊叫“啊!”了,已经庄严地准备要用手掌,而且已经高高举起手臂,但突然他僵住了,似乎改变了主意——

“不,不这样,”别斯巴里奇科夫突然悲

剧性地说,“今天我要改善这个练习。今天我要这样做。”

“啊——啊——啊!”谢苗·谢苗诺维奇令人心悸地喊叫着,他双手撑着桌面,用前额猛击最上面的那块砖。砖片四处飞溅。过了一会儿,谢苗·谢苗诺维奇抬起了头。他双眼紧闭。脸庞上的泪水混着前额上的一股股鲜血直泻而下。

“而我却在此刻打着瞌睡。在正常的课程之后他们唆使我们参加机动部队训练。根据车臣人的订货,我们和他们一起把一些名牌机器运走。在我们的行动中从未出现过偶然事件。所有的行动都计划周全,在卡拉谢夫的领导下进行。现在他已经是中尉了。顺便说一句,此后我和他成了好朋友。行动就是这样完成的。夏天,天刚亮,我们大家都已起床,在第一时间准备好……”

萨列冬往手指头上吐了唾沫,翘起手指,测试着风向。我则手扶着独轮车的铁把手,站在他身旁。车里放着早就准备好的发烟罐。等弄清了风向后,我和萨列冬就躲到随便哪一所房子的角落里,在那儿把发烟罐点着。风开始把白色的轻烟向我们所需要的方向吹。白色的烟雾很听话地落在草地上,灌木丛中,落在清晨湿漉漉的沥青路面上。当那片清晨的、我们所指望的浓“雾”恰好降落在汽车站上我们看中的那块地方时,早在另一方向准备好的谢列加·缅尔基走进这片浓“雾”。这时我和萨列冬开始以秒计时。隐身在雾中的谢列加先是摸了摸早就相中的一辆“奔驰”车的发动机盖,然后悄无声息地把它掀起。接着,他用花匠的剪刀,在手电筒的帮助下,准确无误地对几条重要的电线下了剪子。做这一切仅用了40秒。

于是我和萨列冬走出“雾”区。我们担心备用的照明系统,所以做这一切时动作僵硬,但很有效。这也许是因为我们不止一次地在民警靶场上练习的缘故。……我们披着晨“雾”跑向那个角落,达加也夫已经站在那儿。一辆和他一起到来的警车在不远处等我们。我们挤进车,穿着警服坐在驾驶座上的卡拉谢夫给我们每个人铐上手铐。这时奔驰从角落那边拐了出来。汽车稳稳地行驶着,发出“隆隆”声,而谢列加则显得那么小,从我们这边几乎看不见他在开车。谢列加伸着脖子,脚好不容易才能够到踏板,以致于那辆漂亮的奔驰看来仿佛是无人驾驶的。谢列加的确技艺高超,卡拉谢夫则动作僵硬地驾着自己那民警用的“小玩艺儿”跟在谢列加后面。就这样,我们鱼贯地驶入一块预先说好的空地。那里已经有一辆载货马车在等着我们。卡拉谢夫给我们卸了手铐。在一大堆西瓜中间站着可爱的“美臀”。他把一个西瓜扔给瓦齐克,瓦齐克扔给我,我则扔给萨列冬,萨列冬扔给缅尔基,缅尔基则把西瓜扔给了载货马车的车夫,他正在把这很不错的季节性水果往车上装。卡拉谢夫在他的提货单上画了几下。奔驰便隐没在一大堆西瓜下面了。

然后卡拉谢夫把我们带到警局。他把铁栅栏弄得当当响,把我们带进牢房。里面已经有一个“订货”人在等我们,他就是车臣人阿斯兰。看守把我们和卡拉谢夫一起关进牢房。

“好了,阿斯兰,”卡拉谢夫说,“载货马车从花园环路上列宁格勒公路,运货单齐备。”

“好样的,”阿斯兰冲着卡拉谢夫,说着便把美元递给缅尔基,“按照谈妥的,你 500,其他人每人 400,寻欢作乐去吧,雄鹰们!”说着他把一叠叠美钞递给我们每个人。他最

后递给尤金时说,“好样的,”他轻声说着,还用毛茸茸的手抚摸着尤金的脸,“你会走得很远,如果不早把你抓起来的话。”

“不抓,”卡拉谢夫高兴地许诺着,“否则,到那时我们怎么办?……布兹金,别犯傻了,开门吧。”

铁栅栏一响。我们走出来,事先已把美元塞进口袋。卡拉谢夫和阿斯兰留在里面。我们中间没有傻瓜,我们完全能设想以后的事:

“好样的,”阿斯兰说着便把卡拉谢夫那包钱递给他,“这里是 1500。真是好样的!你培养了一群怎样的孩子啊!雄鹰!……”

“为苏联服务。”卡拉谢夫说着把那包钱藏在腋下。然后他们友好地长时间哈哈大笑,相互击打对方的肩膀。中土布兹金在牢房的另一边被他们的笑声弄得莫名其妙。

与此同时,秋季来临。学校生活又开始了。于是,我们的常规活动改在三楼俱乐部的厕所里进行:喧闹、发泄、抽烟。达加也夫在窗台上跟人甩扑克,还不忘计时,不时地喝一口很不错的进口酒。两个喝光了的空酒瓶放在他们身旁。

晒黑了显得很健康的盖莫克洛宾来到走廊里,俨然是个“领导”。厕所的门被一只脚踹开——

“学校里的抽烟行为什么时候可以停止?”盖莫克洛宾吼叫着,大家都忙不迭地把烟熄灭。“齐格玛杜林,明天和你母亲一起到学校来!把通风小窗打开,检查一下卫生间!达加也夫,这与你有关!兹维亚金恩采夫,为什么你总是这副脏模样?为什么你的领带上写着 X' 字母?”

“哪儿?”兹维亚金恩采夫惊恐地问道,把胸前的领带翻了个面。

“好了，大家都离开厕所，如果不需要方便的话！……达加也夫，这也与你有关……你手里拿的是什么，达加也夫？……”

“啤酒……”达加也夫平静地回答。

“什么啤酒？”盖莫克洛宾惊愕地问，“喂，过来，到我这儿来！”达加也夫拿着酒瓶不紧不慢地走到盖莫克洛宾面前。“喂，呼口气！”达加也夫很乐意冲着盖莫克洛宾的鼻子呼出一口气。“是啊，你，达加也夫，你喝醉了！你这算什么，让自己在学校里像个混蛋！”

“混蛋——是谁？”达加也夫反问盖莫克洛宾，还用手招着耳朵，仿佛听不清似的，“是我吗——混蛋？”达加也夫把瓶子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里，伸开臂膀，使劲朝历史教员的脸上砸去，随着一声难听的声响，历史教员跌倒在墙边，头撞在墙上。

鲜血从盖莫克洛宾的鼻孔涌出。大家都吓坏了，不敢出声。这样的事从未发生过。静悄悄的，只听见从门外传来课间的喧闹声，而且它立即就显得那么遥远。

“我是混蛋？”达加也夫问盖莫克洛宾，“那么你是什么？喂，母狗，告诉我，十二月党人中你还记得谁？……”达加也夫拿着酒瓶口往墙角那边一敲，把有缺口的瓶子放在自己面前，“喂，说呀……”

盖莫克洛宾沉默着，惊奇地看着手里拿着破酒瓶的达加也夫。汹涌而出的鼻血凝住了。他却不擦掉。

达加也夫是我们中间第一个被赶出校门的。接着，安静的瓦齐克·尤金也很快离开了学校。他去动物园当服务员了。后来，真是令人惊奇，萨列冬在职业训练中受够了惩罚……实际上，大家都已中止了学业。在学校里没什么可学的，除了为应付实际生活的计算机，那种大街上的生活又对我们不合

适，但是盖着漂亮印章的毕业文凭满大街都有得卖……我嘛，还没来得及学完所有的功课，因为性格软弱，还不想让祖父伤心而死，就继续到学校去了一段时间……自从弱智但真诚的军事教官别斯巴里奇科夫从我们教学用的原子弹掩蔽所离开以后，仿佛整所学校里流言四起。我听到种种传说，信不信由你，但听说从这个校用原子弹掩蔽所里可以买到并不很贵的卡拉什尼科夫步枪，甚至可以买到反坦克手榴弹。有一次娜奇卡·苏波尔多娃，就是那个在别斯巴里奇科夫时期积极参加护士训练班的那个姑娘，对我说：

“如果你想看，我就可以安全地从核武库偷出几十枚‘科利普索尔’。再叫上阿辽沙、卡奇卡·叶甫多基莫娃、缅尔基，我们试试……但是要有车，没有车可不好办。”

“什么是科利普索尔？”我很感兴趣地问娜奇卡。那时期我已经听说了有关此类东西的许多名词，而在这类事情里这些东西各自的用途，像大家一样，顺便说一句，我已经很了解了……

“效力极强的麻醉剂，”娜奇卡向我解释，“如果你受到了敌人的核攻击，例如，你的腿没了，你疼得都不想活了，那么，在你的残肢里直接注入这种麻醉剂，一切都过去了，刹那间一切都‘OK’，你甚至会有一阵子感到很高兴，因为这么顺利，这么好就摆平了一切——似乎突然发生了核战争，就这样，感谢上帝，你的腿没了……”

“关于这种试剂您从未听说过？……”我很感兴趣地问。

“是——的，”我的那位神经质的口吃医生很不情愿地回答，他早已在我们的心理资询问答中丧失了主动权。“那么您，关一于这一这个，吸毒后2至3年就难逃一死，关

于这一这一点,您那时听说过吗? ……”

“当然听说过,可是在那时,我们已经谁也不想活得太久了……”

经过这次很随意的谈话之后,有一次我和她把她所说的一群人带到了河边我的家。祖父的伏尔加罩着粗帆布平淡无奇地停在并不茂密,但已泛绿的灌木丛中。院子里空空的。已经是春天了。在我们的大房子里的某处已经打开了第一批窗户。从窗里传来了电视机播放的音乐。

“就是它,”我向一旁点了点头,示意那辆灌木丛中的伏尔加,“但是它被锁住了,有报警器,我没钥匙。”

“小意思,”缅尔基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卷东西,“5 秒钟……”

缅尔基向灌木丛走去,很快就不见了踪影,我们站在一旁往那儿看。粗帆布不久就蠕动起来,可立刻又安静下来。过了一会儿缅尔基回来了。

“一切就绪。我把它打开了。你们每人依次从后门爬进去……后门是开着的。从底下稍稍掀起帆布就爬进去……叶甫多基莫娃,你第一个爬进去再翻到前排右座……萨列冬跟着她也爬到那儿去……”

首批两位走了,灌木丛中的粗帆布很快就又颤动了一会后便趋于平静。

“现在我去,”缅尔基对我和娜奇卡说,“以防万一,我坐到司机的位置上。蓄电池没问题吧?”我点点头,“帆布不透亮吧?”我摇

头否定,“确切吗?”我又点点头,“那我就在里边点一会儿灯。等会儿你们爬进来坐在后座……明白?”

我又点了点头。

缅尔基先走了。随后我们也都走了。我们穿行在草丛中,蹲着往下走。我四下里望了望便拽起帆布的一角。娜奇卡首先钻了进去,跟着我也进去了。

“现在锁好门。每一次间隔时别想打开或者出去……即使你非常想出去也不行,”娜奇卡警告我们大家。我们都听话地把自己门旁的按钮按上。

伏尔加里面的顶灯亮着,我们大家卷起袖子,胳膊上扎着从学校反核卫生室拿来的橡皮止血带,都把臂膀伸到娜奇卡面前。娜奇卡灵活地磕断了针剂的小细头,把注射器吸满。她扎得既准确又无所顾忌。用过的针剂和注射器被她立即扔在早就准备好的塑钢制的印有骆驼牌商标的盒子里。

当一切都结束以后,我们倾听着自己的心声,满怀希望地在帆布篷的掩盖下等待着麻醉效应,在莫斯科春夜的寂静中坐了不久。远处传来不知谁家的电视机里索然无



味的音乐。这时,萨列冬拿出“随身听”,把它挂起来让大家听。他打开开关。于是,从萨列冬的“随身听”里传来了轻柔的乐曲,渐渐地这音乐变得越来越响。

缅尔基首先闭上眼睛,开始轻轻转动方向盘,仿佛我们大家悄无声息地上路了,正悄悄地往什么地方去似的。萨列冬和着音乐的节拍摇晃着脑袋,他像是以影片中慢镜头的动作,爬到叶甫多基莫娃的裙下,一下子把她拉到座位上,想要亲吻她的双唇。娜奇卡是在最后才给自己扎针的。她也静静地在我旁边坐了一会儿。她动也不动,像大家一样在等待效应。随后,她悄悄地靠近我,把手放在我身上。我没有挪开她的手,只是看着窗外不动。那儿不久前还挂着祖父的旧帆布,现在已透出了几片云彩。云彩静静地悬在我们这辆车的窗口,音乐变得越来越响亮、强劲,明朗。我往前方注视——一片浓浓的云彩挡在我们面前。缅尔基不知为何激动得双眼闪着亮光,愈来愈快速地转动方向盘。于是我往下看,傍晚的莫斯科在我们下面飘过,整个莫斯科都披上了时髦的广告和灯光交织而成的金光闪闪的亮装。

“往下去!”我对缅尔基大声喊叫着。谢列加开始往下降。我们飞过救世主大教堂的穹顶,降落在油漆渍黑乎乎的莫斯科河畔,河面上也一样映照出无数傍晚金色的亮光……突然,我看见一个蓝色的小芭蕾舞演员穿过云层向我们走过来,她离我愈来愈近……音乐声快要把我的耳朵震聋了……我看见那个蓝色的小芭蕾舞演员靠近我的窗口,我终于看清了她的脸。因为认出了她,我激动得热泪盈眶。我从未体验过如此令人感动的温柔和幸福……

突然,这一切,我所体验过的非人间的一切都嘎然而堕落到黑色的深渊……那音乐

继续了一会儿,随后使逐渐变弱,直到完全止息。

“然后是——无底的深渊。”我对精神病医生说,“绝对的无底深渊……我真的累了,您知道,也许,您能让我到走廊吸一会儿烟?……”

我在医院走廊尽头靠窗站着。窗外暮色渐浓。我边抽着烟,边观察着医院陈旧的院落。在那些湿润的绿色灌木丛中间或有几座雕塑泛着白光。它们是陈旧的、帝国风格的苏联作品……在我的背后——走廊里,在我的眼前——院子里,绑着绷带的、拄着拐杖的病人们在游荡……他们是一些遍体鳞伤的男孩子们,是我的同龄人……我还在抽烟。我抽着烟,回忆着一切。回忆着对于我的生命来说每一个重要的、独一无二的瞬间……那是不能让外人触及的生活……

“天啊,天啊,你的变化怎么这么大!”奶奶喊叫着,把双手放在枯瘦的胸前,并立即拥抱来访的莲娜。

“上帝啊,上帝,她的变化多大啊,”我惊叹着在脑中转着这样的念头,但并没有表现出来。这惊叹是有理由的——这突然出现的少女仿佛是从月球上来的,她有着难以置信的绝妙无比的稚嫩的美貌……顺便说一句,特殊的描绘是多余的,我那突然很不正常地微微张开的嘴巴就是最好的注释。还有紧接着发生的与我有关的一切,我在那些天里所有的体验,我希望能向您们解释。

发生所有这一切的缘由是:他们,我们的父母们,从世界的各个角落同时来到莫斯科,参加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外交系的纪念日活动,他们曾是这个系的同学。说实

话,我已经好几年没见自己的父母了。他们有时回来休假,从国外给我带一大堆过时的便宜货,那些东西在这儿,在资本主义的莫斯科,穿都没人穿。莲娜比较走运,或者,鬼知道,正好相反,她很小的时候就被父母带到巴黎,从此没在这儿出现过。即使她出现过,我也不知道。也许那时没必要知道,而现在,我感觉到,她的出现恰逢其时。

现在大家聚集在这所老房子的大桌子旁。就算一句话也插不上,祖父和祖母也感到很幸福。我们的父母们是主要角色,他们激动地相互打断对方的话,交谈着只有他们才明白的事件,随便闲扯一些只有他们才知道的脏话和蠢话,还不时地发出很不真诚的、甚至是愚蠢的笑声。

第二天我获知,她的父母飞走了。莲娜一个人留在莫斯科。我当然知道在尤什卡区那个半空着的很少人居住的住宅里她的电话,她现在就住在那里。但要采取这微小的行动——拿起听筒拨号——不知怎么我不能。我不明白——以后会怎样?嗯,当她并不是远在天边,而是在这儿,就在近旁——我问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我和衣躺在祖父家卧榻式皮沙发上,双手放在脑后,茫然地注视着天花板。房间另一端的窗外也是一片白色。也许,窗外正在下雪呢。但不知是因为懒惰,还是害怕,我不敢起身过去看看。

她却来电话了。“为什么没打电话?……”
“有事呗……晚上?是的,不,一般说,晚上我没什么特别的事情”我很激动,很礼貌,但撒谎了。“出去?……哪儿?”“……嗯,不去萨列冬的爸爸那儿,真话,天啊……去动物园吧……对所有人都关门,但对我们——请

进吧……你想看怪鸟?”

我们是晚上坐在空荡荡的地铁车厢里到动物园去的。她很想去。我俩不知为何分坐在两个坐排上。我们有时相互望一眼,不知为何有些害羞。就我们俩。这很奇怪,但很好。

瓦齐克·尤金自从离开我们学校后就成了夜间动物园飞鸟部的负责人。在不久前修建的鸟棚里,傍着蓄水池和青草地,苍鹭、大雁和鹈鹕在灯光下漫步。鸭子唧唧叫着,贴近水池边忧郁地凫水,竟能不溅起一丝浪花。在水池中央,几双漂亮的白天鹅高傲的雄姿一动不动地映照在漆黑的水面上。

我们给它们喂食。起先在岸上喂。后来瓦齐克不知从那个河湾的修理处弄出来一只充了气的橡皮船。

“划桨时要轻一些……别把它们吓着了……”

我和莲娜小心翼翼地爬到船上。在窄窄的橡皮船里,瓦齐克把一桶食料放在我俩中间。正如他所要求的那样,我尽力不出声地把桨插入水中。莲娜给天鹅喂食。

后来,靠岸之后,我们还在岸边的水泥地上散了步。瓦齐克一吹口哨,许多鸟儿便扇动着翅膀,稍有些害怕似地在玻璃棚顶下盘旋,不一会儿就又压着水面低飞。很快一切又归于平静。

“夏天它们飞到外边怎么办?”莲娜问瓦齐克,“为什么它们总不飞离您呢?”

“它们的翅膀被修剪过了……这当然是很野蛮的,但有什么办法?没有别的法子能留住它们……它们就是想飞,想飞……”

但是现在谁也不想飞走。这儿安静、明亮、温柔又安详。鸟儿在戏水,而莫斯科夜

晚的白雪已悄悄降落在我们头顶上的玻璃圆顶上。

地铁已经关闭。

“我们得拦一辆出租车。”莲娜说。

“莫斯科已经没有出租车了。都是揽私活的车……”

“揽私活的就揽私活的呗。”

雪还没有停。我走到人行道上，扯着嗓子对偶而驶过的轿车喊叫。

“送你去哪儿？……”我又激动起来，但尽量平静地在桥墩上问她。

“如果你愿意，可以到我那儿坐坐……”莲娜说。我看见她也激动地向一旁望去，好像就是在等揽活的私车似的。

“我愿意。”我诚实又犯傻地回答。

我们走进她家。正如我设想的那样，这套住房里几乎是空的。

“脱衣服吧。”莲娜说。

“脱光了？”我痴痴地问着，又立即解释，“有一次，在一家很有修养的家里，人家就这么对我的一个好朋友说。他便听话地都脱光了。”

“也许，你的朋友是个傻瓜……”莲娜说，“或者是天才。”

“不，他是傻瓜。”我立即附和她。

我脱去了外套和靴子，但不知为何没脱帽子。

“把靴子穿上吧。这儿很冷……”

我听话地把靴子重新穿上。我俩走进客厅。那儿有一张皮沙发歪斜地放在屋子中间，还有一张矮矮的玻璃桌子。屋角的地面上放着一个巨大的电视机和一座真人大小的伏尔泰^①石膏塑像。

莲娜打开电视，但不放出声音。那儿，

在死一般的寂静里，正播映着“新闻”：某人跟着某人向某处跑去并开枪射击。某处有某人不知为何遭人追赶……然后是某人向着某人吼叫，用拳头猛敲讲台。

“帽子可以给他戴上，”莲娜指了指伏尔泰说，“他在这儿比你还怕冷，他是法国人嘛……”

我给伏尔泰戴上帽子。

“喝茶还是别的什么？”

“茶——我根本不爱喝酒。”

“可我得喝点儿。冷……”

她往高脚酒杯里斟了些酒，我们碰了碰杯。我晃了晃那粘糊糊的脏东西。

“这是什么？”

“卡尔瓦多斯^②苹果伏特加。我知道，这很难吃，但在法国，如果感到冷，都喝这个……”

她去拿茶。我又看了一会儿无声“新闻”，然后翻了几页放在桌上的一本时尚杂志，又把它扔在一边。杂志封面上一个酷似莲娜的女人注视着我。这时她来了。真实的莲娜。她端来了茶。

“我迷糊了，”我向她抱怨，“卡尔瓦多斯真让人讨厌，但很厉害。比方说，我刚才竟

① 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本名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法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启蒙运动哲学家、自然神论者。彼得堡科学院国外名誉院士(1746)。伏尔泰是他的笔名。年轻时期，他的抒情诗充满了伊壁鸠鲁主义的单纯快乐、友谊和隐居的情调，内含对专制政体的抨击。成熟期的散文题材和体裁丰富多样，有哲理小说(代表作《老实人》)、古典主义悲剧、讽刺长诗；政治、历史著作等。伏尔泰的哲学思想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准备和推动欧洲(包括俄国)社会哲学思想的发展，都起了很大作用。——译者

② 用来自法国诺曼底的加尔维苹果酿制的酒。——译者

以为封面上的人是你。”我示意那个封面。

“是我。”莲娜说。

“这是真的？”我又问，“这是你？”

“是啊。”莲娜说。

“为什么？”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这是——我的工作……”

电视机里的“新闻”结束了，屏幕上出现了一个钟……然后是一片花花绿绿。我们在寂静中喝完茶。

“还要茶吗？……”

我摇摇头。

“‘卡尔瓦多斯’呢？”

我又否定地摇摇头。

“那你要什么？……”她问，“奶酪？”

“我想，我想再一次看见你那样……就那时……你记得吗？……”我沉默了一会儿，用嘶哑的声音说。

“你疯了。”过了一会儿，她回答。

我们僵坐在那里，甚至不敢动一动。电视屏幕上的白光在我们脸上闪动。

冬日昏黄的太阳照醒了我，阳光刺痛我的眼睛。我睁开双眼看见了近在身旁的她。这么近，甚至太近了——我看不清她。我悄悄地吸了吸鼻子：一阵令我头晕的气味从她散开的头发那儿向我袭来。我尽量不出声地坐起来，穿好了内裤，光着脚，不系鞋带，穿上靴子。我起身走到这间我们在一起的小卧室的窗前。雪停了，天空是蔚蓝色的。我回头望了一眼。她几乎全裸着睡在那儿，很不舒服地把一只手臂蜷着压在身下。她是那么美，仿佛某一位大师用磨砂玻璃吹出的一件精妙作品。“她这是给我让出睡的地方呢，”我明白了。于是，我走到那儿，小心地给她掖好被子。她一动不动。

我走到客厅。从镜子里我看见自己是那么可怜，像个小男孩。我走进厨房，拿了一个杯子。在客厅里往杯子里倒了一些“卡尔瓦多斯”，一口喝干了它。然后我从伏尔泰头上摘下帽子给自己戴上。我拿起她作封面的那本杂志，又走到镜子前。我把杂志



紧贴着自己的脸。我俩的合影极不和谐, 对我很不利。但或许是“卡尔瓦多斯”的作用, 这合影在一瞬间在我看来甚至很可爱。一丝傻笑掠过我的脸庞。

带着这丝傻笑我走进我俩曾在一起的那间小屋。她裸着身体坐在床上, 她在等我。我坐在她对面的凳子上。手里还拿着杂志。

“你为什么这么做?” 我问她。

“因为我想。还因为这是——你……”

“我享有了你的初夜, 一辈子……?”

“是的, 是这样, 你拥有了我的初夜……”

她对我微笑。她的微笑是那样明亮而幸福。但是, 看来, 我甚至在一瞬间不敢相信自己醉意朦胧的眼睛。发生的一切太令人难以置信。

“棒极了!” 无论如何我还是举起了紧握的拳头表示欢迎, “太好了! 但我还是想知道, 你为什么要这样? ……你住这儿看: 这是——你, 这是——我……” 我用一个熟练的动作把杂志举在我的脸旁。

“首先, 你很漂亮,” 莲娜想了想, 又看了看我本人和她的那张照片说, 与此同时她并没有停止微笑, “你就像阿兰·德龙那么漂亮。比他还漂亮, 因为你比他年轻……其次, 你不爱说话但很聪明……第三, 你忠诚又富于激情……你看见我这样, 已经过去多少年了? ……”

“我没计算过……” 我老实承认, “但是, 已经很多年了……”

“很多很多年。而你一直记着我……这一点, 我一直知道并且感觉得到……”

“我记得……” 我很诚实地表示同意, “但你怎么知道?”

“就是知道呗, 就这样……还有, 最后, 你——勇敢, 你是一个可以依靠和相信的男

人……一眼就能看出, 你不是妈妈的乖儿子, 也不是法国人——我觉得, 你经历过火与水等各种考验……”

“不。也许我经历过, 但是暂时只经历过水的考验。但没有经受过任何火的考验……再说, 我也不漂亮, 很瘦弱, 没有运动员的体魄, 还有, 我非常近视, 跟瞎子差不多, 几近残疾。而且也无德行。再说我也不聪明, 至于我不爱说话, 这常常是因为, 我根本就没什么可说的……还因为, 我很胆小, 有什么样的条件我就怎么生活……而勇敢者、聪明人都自己为自己创造条件……还有, 如果说实话, 我应该向你谈谈苏波尔多娃……”

“别说了,” 她求我, 脸上仍挂着微笑, “你暂时还不了解自己, 也不可能了解。而我, 请相信, 了解你的一切。因此, 你就听我的, 并且要记住: 你漂亮, 比阿兰·德龙还漂亮,” 她重复着, “聪明, 强壮, 并且勇敢。你能接受一切, 战胜一切, 克服一切。哪怕仅仅因为, 现在, 你有了我, 这样一个简单的原因, 你就已无地自容……”

“太棒了!” 我重复着这句话, 好像变得更傻了, 又一次高举反法西斯的拳头, “太棒了, 妙极了! 这一切全然没有痒酥酥的感觉! 这一切太棒了! 妙极了! ……”

我重复着这毫无意义的醉汉的呓语, 往空中轻轻挥动着拳头。我感觉到泪水顺着我的脸庞流淌, 但此刻我根本没有因流泪而羞愧。

“奶奶, 请把伏尔加的钥匙给我,” 我向奶奶请求。生活, 正如您所理解的那样, 很自然地要开始与其外在形态相吻合了。

“你正常吗? 你要什么钥匙? 你没有驾驶证……”

“奶奶，给我吧，我确实有用……”

奶奶用手拍拍自己的额头，便把自己房间那扇门锁上了。

“爷爷，对她说，让她把伏尔加的钥匙给我。我只用一晚上，我很需要……”

“她怎么啦？”

“她就这样。”我把奶奶刚才的动作做给爷爷看。

“但是，为什么？”爷爷为我感到委屈，“你开车开得很不错嘛，甚至可以说很好。是我教会你的。我教会了那么多人……是的，你确实没有驾驶证。但我把我的给你，万一有事，你就说——拿错了……”

“那钥匙哪？……”

“你确实需要？……”

“是的……”

“好吧，但是别同她打交道，”祖父向祖母房间那边点头示意，“她非常固执。因为这固执把我的半生都毁了。其实，我这儿还有一把钥匙……”

“你可真讲究，”当我开着老伏尔加车驶到莲娜家时，她说，“顺便说一句，开着它也合适。首先，我从那时起就记得它，甚至它的气味。还有，你知道，在巴黎这种车现在卖什么价？贵得吓人，天价！”

我自信又谨慎地驾着车，我向祖父保证过。

“你带我去哪儿？”

“去认识某种别样的生活，然而你祖国的生活，还有你的同龄人。你说，你完全脱离了这一切？现在我们立刻就让你与现实接轨……”

迪斯科舞厅名叫“奶品”，因为这里原来是一家乳品铺。小铺不久前用世界上最先

进的迪斯科设备改建一新，甚至重新起名为“西南画廊”。但人们仍按老名称呼它。萨列冬从学校出来后就到这儿来干活。

路上莲娜要口香糖。我没有，于是就在一个小铺旁把车停下。

“我自己去买。我很感兴趣……”

莲娜下了车就往那个空地上孤零零的小铺走去。

她把钱递进开着的那扇小窗。立即有一只长满深色汗毛的男人的手把莲娜拿着钱的手盖住。

“什么钱？”一个稍带口音的男人从窗口里问，仍然不松开莲娜的手，“说吧，在这个生活中你想要什么——一切都是你的……”

莲娜想把手抽回来，但里面仍不放开她。

“喂，叫什么，说吧？……”

惊呆了的莲娜还是默不作声地想把手抽回来，但那只陌生人的手抓住她的手指不放。

“我很礼貌地请求你——说吧，你叫什么名字？”

“我不叫什么名字……”莲娜说着又往回抽手，但里面还是不放。

“这就让我感到委屈了，”亭子里的人说着灵巧地一下把小窗关上，把莲娜的手指砸得很疼。

“啊——啊——啊！……”莲娜喊叫着蹲了下来，把受伤的手指插进雪堆里。

我立即就跳了出来。

“喂，开开门，混蛋，”我不顾死活地敲击着小窗口，“听见没有，恶棍，打开窗……”

真奇怪，窗口打开了。

“你怎么，混蛋，你想干什么？跟你好好说呢。混蛋，给你钱……”因为遭受这突如其来的欺侮我几乎失去理智，冲着那黑洞喊

叫,想要看清那个隐藏在货物后面的售货员的脸,并没有想到我自己的脸几乎挤进了那个小窗口。

“我是——混蛋?给你,这些发臭了的俄国钱。我不需要钱——我要尊敬……”窗口里的人恶狠狠地喊叫着回答,刹那间,我的鼻子上挨了直直的可怕的一拳重击,我被掀倒在雪堆上。窗户立即就关上了。莲娜惊呆了小会儿,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不嚼什么口香糖了,”她笑着说,还一边往受伤的手指上吹气,一边用雪擦我的流着鲜血的脸。我感觉到,嘴唇像橡皮一样肿了起来,鼻梁也被打断了,还有这难以忍受的她的笑声。

迪斯科舞厅里热闹非凡。人们摇着脑袋狂舞。我们自然没兴趣跳舞。

“你喝点什么?”我情绪不高地问。

“不,”莲娜扯着嗓子回答,“今天我需要清醒的头脑。我想记住这一切……”

而这恰恰是今天我所没有的。这时,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苏波尔多娃和叶甫多基莫娃朝我们的小桌走来。我极为冷淡地朝娜奇卡点点头。

“莲娜。”我喊叫着向我的小伙伴们介绍客人。

她们相互无所谓地握了握手。

“要吗?”娜奇卡冲着我的耳朵喊叫着,还把包在餐巾纸里的香烟给我看。

“多少?”

娜奇卡两次向我撑开脏兮兮的巴掌。我要了餐巾纸。

“要吗?”我冲着莲娜的耳朵喊叫。

“这是什么?”

“是个瞎子,怎么的……”娜奇卡嘟哝着,“老规矩……”

莲娜否定地摇摇头。

“我想,你也不用了,”莲娜冲着我喊,“就这样你已经想入非非了……”

“作为备用吧,”我喊叫着回答,并把100卢布给了娜奇卡,然后把餐巾纸包着的香烟放进口袋。苏波尔多娃和叶甫多基莫娃无所谓地走开了。我肿着双唇、红肿着鼻子,眼下还带着乌青,像个傻瓜似的傲慢地坐着。

“我们跳舞吧?”莲娜可怜我,问我。我耸了耸肩膀。

“我们跳舞去,”莲娜替我作出决定,“只是小心手指头……很疼……”

也许,这个舞跳得真不错:莫名其妙被痛打一顿的我和巴黎的封面模特、高举着受伤的手臂的莲娜翩翩起舞……

后来我叫萨列冬一起去洗手间。在走廊里我冲着他的耳朵向他讲述了所发生的一切。

“这事没完,”萨列冬同意我的想法,“你站在这儿别动,我去叫几个人过来。我几乎不了解他们,但很厉害,是从巴甫洛夫斯克来的。他们欠着头儿的钱。你把意图向他们交待了,让他们想办法……”

我走进厕所。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真泄气了——一副不正经的、可怜的男孩相。我从口袋里摸出娜奇卡的“老规矩”就一口吞了下去。很快,因为这“老规矩”我的感觉好多了。

巴甫洛夫斯克来的人走到我们桌前,很有礼貌地坐下。

“我是伊凡。她叫莲娜。从法国来……”

我不知为何嘟哝着作自我介绍。

“那个小卖部在哪儿?”

我拿了一张纸,设计着方案。

“你有车吗？用两辆车是最佳方案……
用来迷惑他们……”

“有……”我说。

“给我钥匙……”

我给了他。

“一小时后你们站在这儿，”巴甫洛夫斯克的人在我的方案上在小卖部的对面标上了一个“+”字，“我们以你们为参考点。完事之后5分钟你们在这儿，在波利卡尔波夫大街拐角处取回自己的车……”

他又在纸上画了个“+”字。

“引擎发动着，钥匙插在原处，您都明白了？”他问莲娜，我也摇了摇头，“我们为您惊叹，女士。”他对莲娜说，俯身吻她的手。其余的人临走时也同样如此动作。

“他们想干什么？”莲娜问我。

“我不知道，也许要迫使那个小铺里的人向我们道歉吧……”

音乐依旧轰鸣不止。

我和莲娜准时站在那个可恶的小铺对面“+”字标出的地点。小铺后面白雪覆盖的小路在低垂的冬夜昏暗的月光下幽幽闪亮。从小铺里传来音乐，里面有灯光。

两辆轿车——日古里和我们的伏尔加——从不同的方向同时到达。在我和小铺之间它们悄悄地停下。从两辆车的车窗伸出的4根枪管轮流向小铺射击。可以听见被击碎的玻璃飞溅的声音，还有喊叫声，随后又扔手榴弹，随着手榴弹“轰”的一声响，两辆轿车像来时那样飞快地消失得无影无踪。

小铺已变成废墟，但依然在燃烧着。火光中可以看到躺在黑色的雪地上尸体：一个裤子脱了一半的高加索男人和一个撩起裙子的年轻女人。

收音机仍继续响着。

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便往那里走近些。雪地上撒满了巧克力、伏特加酒瓶和啤酒罐，还有炸土豆片。“老规矩”在我身上还有作用：我弯下腰，从雪地上捡起了一个扁扁的彩色的小包。

“这是口香糖。你要吗？”我问莲娜。

我们惊恐万状地逃离那儿。起先我俩还傻乎乎地到波利卡尔波夫大街上的指定地点去等着要回祖父的那辆伏尔加。但我们很快就明白了，这是白等——那些我们不知名的巴甫洛夫斯克人早就驾着它溜之乎也了。我绕过一个个院子把莲娜带到大路上，拦了一辆无精打采的出租车，莲娜坐上它就回家了。第二天我了解到莲娜已经飞走了，她甚至没作告别。关于伏尔加丢了的事，我觉得，祖父起先还很平静地对待，但两天后他中风倒下，又过了一昼夜他便去世了。我们用公款把他安葬在新圣母公墓里，他安息在契卡洛夫旁边。来参加葬礼的是几个可怜的、谁也不需要的贫穷的老头子和老太婆。追悼亡灵的仪式是由因此而飞回莫斯科作短暂停留的父母资助的。

“格罗莫夫”有人此时在医院走廊喊我，“到医生那里去！你怎么，在那儿抽烟？已经等你半小时了……”

在医生办公室里，我很机敏地放下关于爱情的话题，继续讲述自己的精神病史：

“这时，因为失去了祖父，祖母也在我的眼前表现出某种社会性症状……”

“你简一简直像在神话里似的，总一总在讲爷爷和奶奶……但对于我们，精一精神病医生，与父母的关系对我们的临床诊断更

有意义……”

“那这关系很简单。我仇视他们。有个疯子说得好——他们是卑鄙小人，他们让一切都蒙羞——他们自己的共产主义，还有民主化。一切都唱过了，也搞糟了……而为什么要让老人们和我们来为这一切羞辱付出代价……您看，孩子们无所事事，我在公园里面向他们点头示意，还有窗后那些坐着轮椅抽烟的残疾人。我们父辈们做的蠢事却报应到这些人身上……因此我，真的，我恨他们。还是让我向您谈谈奶奶吧。我爱奶奶。我说了，祖父死了之后她好像表现出某种社会性症状。我把她从一种彻底的心理厌恶状态里拖出来……”

她坐在家里，一连几小时地沉默着，然后又突然口齿不清地嘟哝着一些毫无意义的话：

“你给我解释，为什么玛莎·卡萨维娜牺牲了？……她比我漂亮，也比我善良……而她就这样默默地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献身……还有古丽雅·卡维什尼科娃？……她这么想活……这么喜欢柳芭芙·奥尔洛娃演的爱情片……为什么我现在一个人留下来和你们生活？……卡佳·别兹多洛娃住在养老院里，她疯了，谁也不认得，养老金只有300卢布……”她那干枯的皮包骨的手指抚摸着桌上一张张发黄的照片，照片上是身着皮飞行服、戴着闪闪发光的挡风镜的那些活着或死去她青年时代的女友们，“在这儿，谁需要我们？……或者，你哪怕命令我今天给你喂些什么？……”

我尽量温柔地拥抱她，把她那干瘦的、受尽磨难的身子紧贴在自己胸前。

“你怎么啦，奶奶？来吧，别这样……你知道，我是多么需要你……还有，现在该是

我喂你了……”

“我说了，关于钱的问题，确实糟透了。一般说来，在学校里学习从经济上看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早就连去都不去了。而在街上，像从前一样，谁也不需要我们去做一些犯罪之外的任何一件平常事。偷车倒是赚钱不少，但也够危险的，万一失手那可够呛……那时，说真的，奶奶没有了我，一个人在世上可怎么活？……于是我想起了弗拉基米尔·鲍里索维奇……就是那位达加也夫的开朗的姐夫，达加也夫曾拿他吓唬校委会的……达加也夫答应介绍我们认识。不久弗拉基米尔·鲍里索维奇通知我们在中国餐厅见面。我们这两个公子哥儿准时到达。他们已经在等我们了。

达加也夫和我——我们俩都系着领带、梳着分头。餐厅的大堂里一派中国景象：中国式的红灯笼从天花板垂挂下来，架在火上的盘子里煮着各式中国小菜。但我几乎连碰都没碰它们。我专注地听着弗拉基米尔·鲍里索维奇说话，他几乎一直在与人谈事情。只有达加也夫熟练地使用着筷子。旁边一桌是弗拉基米尔·鲍里索维奇的保镖们——几个大胡子的健壮男人——正狼吞虎咽那一桌中国美味。筷子在他们手中看起来很可笑。

“你先换成跑长途的。证件我们给你准备好。特列伊列尔已经在加里宁格勒等着你了，所有的货单都准备齐全，但都是伪造的。货物是走私的，在俄罗斯这里所有的关节都已打通，甚至和侦缉部门也已谈妥。还有，过岗哨时，无论是这边的还是那边的，哪儿也别停，你只需边开车边从窗口扔出一个火柴盒。这边，每个火柴盒里放50卢布，在

那边放 50 美金。在海关,那儿会按登记号放你过关。你到索尔恩采沃去交货。为此你将得到两成半……”

“车厢里装的不是毒品吧?……”

“关你什么事?就是带多个核弹头的地对地导弹又怎么样……为一车青豌豆可不会出这么多钱。怎么样?……”

“行。”我说。

“那好。”弗拉基米尔·鲍里索维奇举起酒杯。

“谢谢,但我不会喝……”

“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再给你加 500……这是定金……”他递给我一个信封,我立刻把它装进上衣里面的口袋。

“他现在必须打个电话,”达加也夫向我这边示意说,“公用电话间在走廊里……”

“用我的打吧。”弗拉基米尔·鲍里索维奇把手机递给我。

“不,他就是得去公用自动电话间。那儿有人给他打过来……”

“好吧。”弗拉基米尔·鲍里索维奇同意了,于是,我和达加也夫走到走廊,向厕所那边去。

“你明白了,这是什么样的男子汉?这不是男子汉!这是金子!”达加也夫轻轻地拥着我,说,“从你全部所得中我抽 10%,这是老规矩,但很公平。请原谅,哥们儿,这就是生活,很显然,这就是市场经济……”

我从口袋里摸出 100 美金,先给了他。我们走进厕所。达加也夫把我推进小间,立刻把门插上。

“要吗?”

“不,不想……”

“随便吧,哥们儿。我可是要……”

达加也夫脱去外套,把它挂在挂钩上。从裤袋里掏出一根橡皮带。

“帮帮我。”他求我,一边把橡皮带扎在上臂上。

这我会。我帮了他。

我那辆装好货的大拖车停在加里宁格勒港口。车厢两侧涂满了令人费解的外文。透过大玻璃我从港务监督处这边注视着它,惊恐的冷汗从我的额上渗出——这样的车我甚至在梦中也从未见过。在我向港监处递交的证件上盖了许多图章,还有最后放行的花体签字。有一艘外国大货轮驶离港口,在驶近灯塔时它拖着长声拉响汽笛,不知为何我因此而更感到卑劣。四周泥泞不堪。黄昏临近。

“喂,小伙子,你还得等两小时呢……别戳在这儿,去吃点儿东西吧……”

在港口旁的小酒馆里我要了不堪入胃的冷冻杂拌和滑溜溜的凉饺子,用叉子拨了一阵子,就开始给早就准备好的那些火柴盒分类……我拿出一包 500 卢布的钞票,便一张张逐个往小盒里塞……那可怕的轮船汽笛声又响了。

“在加里宁格勒的那种孤独忧郁的日子,我这辈子从未经历过。还有,我有生以来从未驾驶过大货车,而且还不知装载的是什么货,我也从未沿路扔过小费。然而最主要的是:我完全是孤单单一个人,在全然陌生的城市里,前面是一条孤独的旅程,万一发生什么事,我知道,不会有任何人帮助我或者解救我。”

我走到一排卖各类杂货的帐篷前。在一个小铺里我买了些路上吃的面包和肉肠,在另一个帐篷里买了些牛奶。当我买牛奶时,我看见柜台下有一只缩成一团的猴子。

“它怎么是个秃子?”我问售货员。

“本来就这样……”镶着金牙的售货员贪婪地回答,“自己爬来的,讨厌鬼……对这儿的气候不适应……潮湿……”

猴子看了我一眼。我惊奇地发现,在它的目光里隐露出我几乎已经忘怀的善良,或者,至少是某种善意的好奇。我从包里拿出一块肉肠扔给它。猴子吃着肉肠又向我感激地看了一眼。

“别这样,小伙子,会把它惯坏的……”

“把它给我吧。”我出乎自己意料地请求他。

“真不错——给我。那我给这畜牲投了多少资啊?……”

“那么,卖给我吧……多少?”

“开玩笑……”售货员说着,想了一会儿,“这个数……”

“我没有。”我说。

“没有就算了,”售货员说着走到一旁,而我和猴子还友好地相互注视了一会儿。过了一会儿售货员推着一个箱子回来了,“你有多少?”看见我没走,他又问。

“嗯……500……”

“硬通货?”售货员又想了一会儿,“好吧,给钱,拿走……”

他数了一遍美金就把拴着猴子的铁链递给我。

“它叫普洛沙……好吧,普洛沙,跟这小伙子走吧……祝你好运……”

我驾着货车行驶在傍晚落寞的公路上。被我用链条牢牢锁在车门把手上的普洛沙坐在我身旁。路上我们沉默了许久。

“我这是带你去莫斯科呢。到了莫斯科就送你进动物园。到瓦季姆·尤金那里去。他是我的同学……是一个很好、很善良的

人。当然,我也可怜你,有什么法子呢?……我绝不能把你带到奶奶家……这有些犬儒主义……爷爷刚去世,而我把你带去……取而代之,怎么的?……去动物园嘛——有吃的,还有人照顾……你等着瞧,皮毛会重新长出来……”

奇怪,这个不紧不慢的途中谈话竟安慰了我,似乎确实有一个亲近的,至少是我愿意与之交谈的人突然坐在我身旁。那猴子也平心静气地坐着,向一旁微微地侧着身子,我似乎觉得它像个并不很笨的人。

前面出现了岗哨。我轻轻地踩着刹车,然后稍稍弯着身子挡住猴子,把身旁的侧窗摇下。

“现在你看着吧,我们如何变戏法……只是在你们潘帕斯草原上没有这个……这样的事在潘帕斯草原上绝对不允许……”

我取出一个藏有钞票的火柴盒,当我的车经过国家汽车检查局的岗哨时,把火柴盒扔进一个洞里。普洛沙有些吃惊地看了我一眼,而我则从后视镜里看到一个穿军用雨衣的身影从路上捡起那个火柴盒。

“喂,普洛沙?……”我又问道,“你什么时候见过这样的事?……”

普洛沙颇含敬意地摇摇头表示回答,我则哈哈大笑起来。也许,这是最近以来我第一次大笑。

这是冬末春初时分白昼变长了,黄昏延续着。小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公路上几乎看不到车。我已驾轻就熟地很自信地把车开得飞快。我打开收音机,但又不知为何不想听那些唠叨不休的广播,便找到一个播送歌曲的音乐台。有人用外语唱着寂寞难耐的歌。但是,此刻,在大货车的驾驶室里,伴着蒙蒙细雨,公路在我眼前飞速向后



逝去,我听着这些,感觉很不错。普洛沙也在听。它低着头,俨然像一个大活人。

“我们好像该吃晚饭了?”我问它。

我们在沥青公路旁的一个小棚旁停了车。雨停了。雨后的树林在落日的余晖中闪闪发亮。我打开一个牛皮纸包,把肉肠放在上面,又切了些黄瓜和西红柿。往杯子里倒了些牛奶。普洛沙的爪子伸向肉肠时差点儿没把杯子打翻。我轻轻地戳了戳它的爪子:

“等等再拿。按程序做……”

我做了个夹肉面包给猴子。普洛沙用两个前爪抓住面包放进口中,开始咀嚼起来。我也就着牛奶吃自己的那一份。

“‘犹如烟雾闪亮着直冲云霄’我自己也颇感突然地念起不知为何在某一时刻记住的几句词,其意义我也不甚了了。我继续吃着,“‘犹如阴影滑行在地上!……’”

那猴子已经吃完了第一份,它等着我继续给它吃的,因此我觉得,它在听我说。我把一杯牛奶递到他的爪子里。它喝了一口,

稍稍洒了点儿牛奶,就把杯子放下了。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你喃喃低语;不是明朗的雾霭,而是逃离那雾的阴影。”

猴子几乎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看着我。我又做了一个很大的夹肉面包给它。

“拿着!”

猴子接过面包,向天花板上翻了翻白眼,把吃食放进口中。

“顺便说一句,你不知道吧,什么叫极乐世界?”我问它。但那猴子被肉肠和新鲜面包所吸引,甚至连瞄都不瞄我一眼,“当然,你是不知道的。再说,真的,我和你,老兄,我们从哪儿知道这个啊?……”

当我们来到被节日的彩灯照得通亮的加油站时,那里空无一人。起先我找油槽找了很久,拿着钥匙到处试。普洛沙坐在驾驶室里,那儿的窗子还像从前那样稍稍打着。当我把油枪塞进货车的油槽时,便把加油柱上显示器转到“500”。这时有两个健壮如牛的男子从加油站里出来。当我付钱时,我的眼角扫到——一个人把驶来的奔驰的

油槽盖拧开,另一个人把已经塞进我的油槽口的油枪取出来,塞进“奔驰”的油槽。由于委曲和愤恨我热血上涌,但起先我还忍着。我付了钱——而那辆奔驰的司机已经手里拿着钱站在我后面,我的脖子都能感觉到他的呼吸——我回到我的货车那儿,默默地把油枪从“奔驰”的油槽取出,塞进我自己的油槽,然后我举起来,向着收款员喊:“可以了!”

“不行,”那个开“奔驰”的人面无表情地对收款员说,“给我先加。”

“您,先生,请先弄明白,然后再来。我这可是往该插油枪的地方加油呢……”

“加里克,”开车的人对他的搭挡说,“把油枪放回原处……”

加里克走到我面前。起先,他用两个指头夹住我的鼻子,把我的头转来转去,然后向我的胸前猛地一推,就把我的油枪取出,转过身不紧不慢地向他自己那辆车走去。眼泪涌出我的眼眶,我完全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跳起来便去追他,边跑边给他猛的一拳。我又跳将起来,双拳猛击他腰部上方。那人稍稍有些失去平衡,蹲了下来,突然双膝着地倒下了。他的搭挡跑过来往我的腹股沟狠踢一脚,但我忍住了痛,甚至还有力气往他的牙齿上和鼻子上猛击几拳,尽管我明白在这样的较量中我没有胜出的希望。有一阵子我双手护着头躲着从不同方向挥来的拳头,我像一头狼似地转来转去,否则有可能会被活活打死在沥青路上。突然响起了一阵野兽的狂叫,普洛沙挣脱了锁链,怒号着、呼啸着,拖着残剩的链条,出现在打架的人中间。它挥动着黄色的爪子,开始猛打那两个人的脸,还毫不留情地用它那野兽的利爪在他们的脸上抓出道道血痕。那两个人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也怒号着,狂叫

着擦着脸上涌出的鲜血。

“够了,普洛沙,停止!”我喊道,并试图抓住残留的那截锁链,把它拉回驾驶室去。但普洛沙好像失去了理智,他从我这里挣脱,怀着仇恨追上那两个男人,跳到他们背上,死命地咬他们的肩膀,那俩人惊恐万状地跌倒在地,鲜血洒在沥青路面上。

最后,我终于给普洛沙锁上链条,关进驾驶室。我猛一踩起动器,在漆黑的道路上加速飞驰而去。

“好了,现在但愿我们到边境的汽油够用。否则,普洛沙,他们追上来,我们就彻底完了……”

浓雾弥漫的早晨。我和普洛沙的那辆大货车停在货车场上。车身几乎隐没在浓雾中。从一旁看去,货车就像一艘漂浮在港口的轮船。

我被一阵浑厚的咏叹调吵醒,然后又听见雄壮的胜利者的合唱。

在我充作卧室的驾驶室里一片难以置信的混乱。我的外套、衬衫和毛巾被撕成碎片并被挂得满处都是。天花板上和座位上扔着被咬破的我的昂贵无价的火柴盒,还有那些撕碎了的我们的和不是我们的钞票。普洛沙的脸上和胸前洒满牛奶。普洛沙正背靠着通风窗听音乐,它还把音量放得最大。

“你都干了些什么呀,丑东西?!”我意识到发生的一切,惊恐万状地问。普洛沙贪婪地、很不友善地、绝对野兽般地看了我一眼。也许它感到非常委曲,因为我有这么一段时间躺下就睡着了,把它给忘了,似乎很长时间没有给我俩共同的生活以启示。

“我们现在还怎么带你到动物园去啊,你这个笨蛋,母狗?”我几乎痛哭出声,忍无

可忍中我往它那贪婪呆傻的嘴上猛抽了一巴掌。我立刻就得到了回应。我们俩较量的时间并不长,然而却是毫不留情的、血淋淋的。也许这一切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我突然明白:我们俩的关系处在一个不大的、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空间。应该说明的是:与此同时,合唱在继续着。

当我终于走出驾驶室时,晨雾已散。普洛沙仍然恶狠狠地在驾驶室里团团转,一会儿用胳膊,一会儿又用额头想把玻璃撞破。普洛沙把我的掌心抓破了,鲜血不住地流淌,但我不想找人帮忙,也许是因为害怕。

我打开事故急救箱,拿出一捆电线,并用电线紧紧地捆在胳膊上。血慢慢地止住了。于是,我等待时机,克服了害怕的心理,又爬回驾驶室,一下子从门口就扑向普洛沙,把它挤在驾驶室的一角,并用连着门把手的链条把它锁住,为了保险,我又用电线把它又捆了一遍。应该说,普洛沙的眼光不知为何变得安静了,最后它变得静悄悄的,似乎讲和似地呆呆地看着自己眼前的挡风玻璃。

我和它就这样驾着车走了很久。普洛沙是被捆住了的;而我的双手则伤痕累累,缠满了绷带。

“你瞧,普洛沙,你毕竟是头笨兽,”为了不打瞌睡,也为了减轻因流血冲突而导致的体力上和精神上的负担,我始终在嘟嘟囔囔地说一些废话,“而我本来已经对你寄予厚望了……我已经考虑,我们真可以做朋友呢……我还给你,你这讨厌鬼,读过丘特切夫呢……还问过你关于极乐世界的事……但是,普洛沙,无论你给狼喂多少食……”

普洛沙一动不动地坐着,时而认错似地看我一眼。

开始时,我还给警察和哨兵扔装了钱的火柴盒。后来,我害怕被揭穿,被追捕和正义的报复,因为我再也没有精力对付这一切——我就不再扔火柴盒了。

我手臂上的血还不住地流淌。我用舌头舔去鲜血。手臂上仍然扎着电线。

上帝保佑,我们终于抵达目的地。

当我拉着猴子的爪子到尤金的鸟棚时,瓦齐克看见了我们。他当然有些吃惊。

“你怎么啦?”瓦齐克问我。

“这是普洛沙抓的……”

“什么普洛沙?……从尤什卡那儿?……”

“不,”我摇摇头,又把链条递给瓦齐克,“给。这是给你的礼物。你看,有些掉毛,但这是因为潮湿……如果好好喂它,就会长好的……它叫普洛沙……”

瓦齐克接过锁链。我坐在水池边的台阶上。瓦齐克拽着普洛沙在我身旁坐下。我现在跟谁都不想说话,也没什么可谈的。但我还是问了他一句:

“你怎么这副萎靡不振的样子?”

瓦齐克起先没有回答。后来,他把一把食物扔给鸭子,叹了口气,轻轻地说出了难以置信的消息——

“娜奇卡·苏波尔多娃被打死了……”

我甚至没明白他的话。我既不惊叫,也没因痛苦而叹息,也没再问他什么。

“卡拉谢夫说,一个拉皮条的车臣人在楼梯口把她干掉了……”瓦齐克又把手指伸进嘴里,吹出一声长哨,鸟儿们在天花板下扇动着翅膀,喧哗着飞扑过来。瓦齐克无声地哭泣。

葬礼上我们大家都哭了。甚至连“美臀”也从外衣口袋里掏出一块脏手帕擦眼

泪。来参加葬礼的谢苗·谢苗诺维奇一身军装。冻坏了的达加也夫拥着泪流满面的化学教师斯维特兰娜·瓦连京诺夫娜。还有尤金、我和萨列冬……

“也许有人想对娜佳说些告别的话?”穿着寒酸的苏波尔多娃的妈妈轻声问大家。

但是,谁也不想说什么。无需言语我们已经明白了一切。

神父晃动着长链手提香炉,对娜佳喃喃低语。也许,这是在这片土地上为她进行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宗教仪式。

“今天说够了吧?”我问精神病医生,“也许,早晨再谈?……”

“不一不,格一格洛莫夫……没有时间再一再谈了……关于你,必须尽快作出决定……”

“那就再让我抽支烟。”

“格洛莫夫,你烟抽得很凶啊……”

“嗯,不,不多,正常。我想,总之,我就要戒了……现在我不知怎么……也许,我激动了。”

他们又放我到医院走廊,我又靠着窗抽起烟来。透过烟雾我审视着医院里傍晚的花园。那儿,在浓密的墨绿色的树冠上,在灰白的无云的天际已经有几颗星星闪亮。

娜佳的死像最后的死神突然给我们大家重重的一击并画上了浓重的句号。现在已经不是孤独感在延续。我觉得,我被最后窒息的时刻降临了……我用开大货车得来的余钱买了一张机票,全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样做,便飞到了巴黎……我有电话号码……我打了电话说,我将于某时在巴黎的某处的一个洁净的咖啡馆里等待她……

莲娜准时来到。她开着一辆很漂亮、洁净的敞篷车。我不知道这种车的牌子。看见我,莲娜高兴得跳了起来。我看到,一切都是真诚的,都是事实。

“上帝啊,什么风把你吹来了?”莲娜毫不扭捏作态地吻着我问。

“来看你。”我也同样真诚地回答她。莲娜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向走过来的女招待要了一杯不带汽儿的矿泉水。

“不知为什么突然很想你,”我很不自在地说,又因为突然脸红而非常害羞,“这就决定飞来了……”

“而我恰恰想给你打电话呢,”莲娜说。我看到,她不知为何也有些不好意思,而且也突然脸红了,“我想把你叫到这儿来……哪怕小住一阵子……”

“瞧,”我一口喝完了杯子里的咖啡,“我在这儿呢。”

“我必须和你商量……确切地说,是问你……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你看,我想嫁人……”

我没有吼叫,没有打碎玻璃,也没有用脑袋撞墙。我沉默着,一动不动地僵呆了,双眼呆滞地望着前方——视而不见。

“他比我年长许多……”莲娜抱歉似地看着我继续说,“他爱我……他与妻子离婚了,带着孩子……他没说什么——这是因为我,但是这就是因为我,我知道……他是俄罗斯人……在20年代当他父亲还是孩子时,被带到这里……他生活很富裕……还有,他聪明,也很善良……我想介绍你们认识……还有,想请你告诉我……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她重复着,沉重地深深地吸了口气,但我又突然没有任何勇气回答她,或者说些什么,甚至连动都不敢动,或者向她证明,我还活着。

“你什么时候回去? ……”

“今天。”我撒了谎。

“今天?”莲娜惊奇万分,“真遗憾……什么时候?”

“晚上……好像10点……”

“怎么,东京航班? ……”

“我不记得了……”

“那我们现在就到他那儿去……离这儿不远……现在就去……好吗? ……嗯?”

她把车钥匙放在我手里。

我开车带着她。白天,街上车不多。我俩默默无语。风吹动着我们的头发。

“往前……然后向左……现在就一直往前开……”莲娜不时地给我提示,“顺便问一句,奶奶怎么样?”

“没什么。她问候你。爷爷死了……”

“怎么死了?”莲娜万分吃惊。

“就这样。死了呗。永远。”

莲娜在胸前画了个十字。我们沉默了一阵子。巴黎在我们身旁飞逝而去。

“顺便说一句,我偶而在这里找到了一间带银屋顶的金房子。是个餐厅……”

“瞧,多好啊,”我竭力平静地说,“那可以像模像样地举行婚礼了……”

“不,我想,在那儿举行婚礼还是不行。婚礼应该在七重天上举行,而这个餐厅位于跳蚤市场……”

我仍然听话地一直朝前,然后转弯向左——然后又一直前行。

通过在我们面前敞开的黑铁大门,我们驶入一座宅院。在那修剪整齐的草坪上耸立着一座四层楼房。主人出来迎接我们。他知道我们要来。莲娜给他打了电话。

“弗拉基米尔。”那个很令人好感的灰白头发的男子自我介绍着向我伸出晒黑了的有力的手。他穿着一件稍稍显旧但很优雅的外套。

“伊凡。”我握住他的手回答。

莲娜默默地吻了吻他的脸颊。

“一路上过来,洗把脸吧?”他操着纯正的俄语问我。

在宽敞豪华的盥洗室里我不止一次地照镜子。我洗了手,洗了脸。在十几条毛巾里挑了一条擦了擦。盥洗室像个博物馆——它的一半被古代雕塑占居着。

客厅的桌子上摆着三个人的餐具。一扇巨大的窗子敞向房子的另一方向。那儿是小花园和小池塘,池里的水是黑色的。在池中央,犹如在瓦齐克·尤金那里,有几只白得刺眼的天鹅一动不动地浮在水上。

水晶餐具闪闪发光。穿着双排金扣制服的大胡子男仆启开一瓶葡萄酒,给莲娜斟了一些,她尝了尝便微笑了。仆人微微躬身接着给几个酒杯都斟满了酒,随后悄无声息地退出。

大家喝了一点儿酒,刀叉在静默中发出声响。

“您是否知道,什么是极乐世界?”为了打破沉默,我寻找话题。

“不,”主人很友地回答,“很遗憾,我不知道。但我可以去书房拿字典,我们看看。”

“谢谢,这就不必了。暂时没必要。”

仆人端着一个装着沙拉的巨大的银盘子回来。

“冬天天鹅会飞走吗? ……”我透过微风吹拂的白色窗纱,瞧着水池上那黑色的水面问道。

“不会。”主人回答。

“它们的翅膀也被修剪过，”莲娜回忆着，“否则不行，”莲娜向我作补充，“否则它们会飞走的。”

大家嚼着脆生生的青菜。

“您做什么工作？……”主人问我。

“我是长途货运员……”我回答。

“你是什么？”莲娜不明白地问。

“我开长途货车……您的工作什么性质？”我不让任何人深入探讨我生活中不必要的细节，掌握主动地问主人。

“我经商。经营化妆品……”

“很久没去俄罗斯了吧？……”

“不，恰恰相反，我经常去那里。”

“怎么会呢？”

“做生意。有事。”

“有意思，在俄罗斯能有什么事与法国化妆品有关？……”

主人没有立即回答。

“嗯，首先，我就是俄罗斯人，莲娜大概已经讲了……”

“讲了。”莲娜肯定地说，我也点了点头。

“因此我回家，回俄罗斯总是很高兴的……其次，我的家族与俄罗斯合作已经快40年了……”

“合作的实质是什么？……”

“您确实对此感兴趣？……”

“感兴趣。”我肯定地说，因为在这种场合我和他总得有话可谈。

“也许，这不是餐桌旁的话题，”主人稍表歉意地说，“但还是现实的。至少对于成年人来说，这甚至很好玩。我觉得这并不突然，也并非没意思。而且，看来，所有这一切也并不特别有伤体面。莲娜知道……”

“我知道。”莲娜强调着。

“您瞧，在俄罗斯，我们，我们家族和我

们公司与你们的莫斯科政权有着传统的友好合作，从事废物利用，提供粪便再利用技术……”

我沉默了。大家又接着咀嚼。

“问题在于，它们的化合物组成部分被积极地利用在高质量的化妆品生产中……”

我仍然做出一副正常用餐的样子。

“顺便说一句，”他小心翼翼地继续着，“我现在恰恰在找人，以便及时领导我们在莫斯科分部的工作。那儿现在有一个莫斯科人，很有经验，很不错，但太老了，他早就想辞职……也许您能给我举荐一个能干的、有前途的年轻人？……”

不知为何我立即想到了“美臀”。

“我考虑一下，”我把脑子里的念头赶走，彬彬有礼地放下刀叉，“但是，莲娜也许已经对您说过，我是晚上的飞机……我希望，我们还会见面，在这儿，在莫斯科……”

我起身告辞，他俩也站了起来。

回去的路上还是我开车。我俩再度沉默。莲娜又重新给我指路。后来我们停在往机场方向去的环路上。

我下了车，关上车门。

“请别再送我了。”我请求莲娜，她没有多问就明白了，再送我一程毫无意义。

“请你理解我，”她仍然坐在客座上说，“在这里，就我这个职业而言，单身独处是不行的……”

“我理解。”我说。

“而且，我也不能扔了这专业。没必要，挺蠢的。还有——这是饭碗……”

“还有——这很漂亮……我走了，行吗？”

“但是，在告别时，我能吻你一下吗？”

她从车里出来，绕过它，向我走来。

“我该怎么办，万尼亚？”她轻声问道，身子离我很近很近。

“嫁人，”我残酷又生硬地说，“你必须嫁给他，莲娜。给，”我又叹了口气，把车钥匙递给她，“坐下，快走……”

她想吻我，但我弯下身，没让她这么做。

于是，她没告别就坐进车走了，而我整整一夜呆坐在机场里，背靠着贴满广告的墙。

“那一夜，我除了如何杀死自己这一件事，其他什么也不想。只是到了早晨，我突然回忆起某人曾经说过，自杀是可怕的罪过。难道在那儿，在另一个永恒的生活里，也为我准备了如此卑鄙下流的事？……晚上我想好了，自己觉得很成功，退一步说，也可以不自杀而死。我决定指望谢苗·谢苗诺维奇。还是在娜佳的葬礼上我不知为何下意识地要了他的电话，并且获知，在离开我们之后，他用某种方式自愿进入了特种兵部队，并且当了教导员……”

“你考虑好了，格罗莫夫？……”谢苗·谢苗诺维奇问。我们是在“革命广场”地铁站会面的。

“考虑得很好，”我肯定地说，这是真心话。我确实细致详尽地把未来想了一遍，那儿的一切都对我合适。

别斯巴里奇科夫像在葬礼上那样又穿上了军官服。

“你跟军事办事处怎么说？”

“已经一年多了，我活得像只猫。有一次在剧院，我的脑袋撞到了大鼓上……”

“也许，你确实不正常？”“谢苗·谢苗诺维奇突然颇为怀疑地看着我，好像第一次见我似的。

“不，我很正常，”我回答，“如果您怀疑，那么，这就是十字架。”我画了个十字。

“你的问题是需要证明，否则无论如何你也不能到我们这里来。你在心理上潜伏着危机。得把这个材料从你的档案里抽掉……如果没有这个证明材料——其他的一切由我负责。”

别斯巴里奇科夫跟我握了握手便走进驶近的地铁车厢，列车很快就隐没在黑漆漆的地道里。我单独一人留在车站。

“格罗莫夫，”有人喊我。于是，我全裸着走进军事医学委员会主席的办公室，“一年前你强调，头疼，全身无力，小便失禁，夜夜失眠。现在你说这一切都不曾有过……”

“不，”我呆呆地说，“曾经有过，但好了。”

“不治而愈？”

我耸了耸裸露的双肩。

“如果一切症状都消失了，你可真糊涂，明天你就得应征入伍。这一点，你明白吗？”

我又一次毫无意义地耸了耸肩膀。医学委员会主席疑惑地一页页翻看我那本医疗档案。

“对你说过多少次了，格罗莫夫，根据客观材料，我应该招收你，但证明上说你不正常……问题就出在证明材料上……你坐着等吧，我去向政委说明……”

他摔上门走了。我立即从他留在桌上的那些档案中找出那一页证明，塞进嘴里嚼碎咽下。

主席回来了。我换了个姿势坐在凳子上。

“挺冷的，”我抱怨着，但主席连看都不看我一眼。他又一页一页地翻找，“真不明白，”他最终嘟囔着，“你的那个鬼证明在哪

儿呢?”

“什么证明?”

“你这儿本来有一页证明,说你小时候脑袋撞到大鼓上?……”

“就这样,我进了613303空降部队……”

“等等,”我的心理医生打断我的话,“那个证一证明,你真的有过?……”

“有过。”

“你把它吃了?……”

“吃了。”

“真是个傻一傻瓜啊……”

“因为条件的某种奇怪的巧合,我的战时洗礼是在那家名叫‘敬礼’的医院中的反高加索行动中进行的。那家医院就在那个学校附近。实际上,这一切就是不久前从那儿开始的……”

那次行动由我们和地方民警参加。我们戴着深色防护玻璃钢的头盔,挎着枪嘶喊着战斗口号,把那些半裸着的、睡意朦胧的、被烟熏火燎的“高加索民族主义分子”从旅馆的房间驱赶出来,沿着楼梯把他们往上赶。赶上一个就把他打倒在地,捆上手脚,然后继续跑。

在宾馆的一座高楼的屋顶平台上,几个战士和民警从不同方向扑来。屋顶被闪闪发光的红色信号灯照得通亮,这些信号灯是给准备在伏努科夫机场降落的飞机照明的。交火不久我们就接连绑住了两个高加索人,第三个人边打边撤得以逃脱。我看见,离我不远处,谢苗·谢苗诺维奇中了他的枪,直挺挺地躺倒在水泥地上。他稍稍迟疑了一下,还像先前那样一动不动地躺着。突然他一翻身抓着那撤退的人的双脚,猛一下往自己

身边拉。那人滑倒了,向下滚去,挂在屋沿上。过了一瞬间,别斯巴里奇科夫神色紧张地跑来抓住那人倒挂着的双脚。

“这是阿斯兰,”有人在背后说。我回过头去,立即就认出了卡拉谢夫,就是那个曾经很年轻的中尉,那个不久前在我的温柔年华扇我的耳光,把我打得痛苦不堪的人。

“卡拉西?”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又问。

“怎么?认不出了?”卡拉谢夫说,“这是阿斯兰,”他指着那个被谢苗·谢苗诺维奇抓住双脚倒悬在屋沿的那个人说,“就是他把苏波尔多娃打死了……”

“你撒谎?”我倒吸了一口气。

“畜生才撒谎。”卡拉谢夫信誓旦旦地嘟哝了一句。

我一下子跳到别斯巴里奇科夫身边。

“阿斯兰?”我什么也没对谢苗·谢苗诺维奇说,冲着下面喊道。那个倒悬着的人迟疑了一下便向我们转过那张被恐惧扭曲了的脸。

“这是阿斯兰,”我已经很确定地对别斯巴里奇科夫说,“是他打死了娜佳·苏波尔多娃……”

谢苗·谢苗诺维奇看了我一眼,稍稍迟疑了一下便松开了双手。伴随着可怕的喊叫声,阿斯兰仍然那样蜷曲着身子消失在黑暗中。我们听见了身躯碰撞柏油路面的闷闷的折裂声。

卡拉谢夫站在烟囱旁默默地看着我们。

“也许你撒谎了,卡拉谢夫?”我突然明白过来,走到他跟前,用枪逼着他到墙边,“也许他没有杀死娜佳?也许我们杀死他是为了你,因为你想消灭罪证?……”

“撒谎是畜牲……”因为恐惧而脸色煞白的上尉卡拉谢夫说。

“好了,好了格罗—莫夫,你—你又晕乎了……”我的那位奇怪的,但又富于人性的心理医生说。我一开始讲述我的军旅生活的波折,他就变得无精打采。

“是啊,是啊,练兵时我也听谢苗·谢苗诺维奇说过,我也这样考虑过自己的事:‘你知道,格罗莫夫,老兄,你确实犯晕乎’。请相信我,我内心早就准备好确实犯一回晕并且真诚地希望这样做。战争,正如您了解的那样,完全是晕乎一片,我早就设想,这样晕乎甚至可以为我们的军事行动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于是,我们小分队带着武器装备从贝科夫出发被空投到车臣……我们降落在晨雾中,刚一落地便遭遇炮火轰击,然后他们便开始向我们进攻……

我们从灌木丛撤到一条浅沟,时而爬行,时而匍伏,时而又小跑着不断地射击,在雾中开枪或扔手榴弹,在这个陌生的雾气腾腾的地带转圈,而在我的身旁,我知道,朋友们已经永远地倒在清晨露珠莹莹的草地上,而几分钟前我和他们还在军用运输机的隆隆声中抽烟呢……

这次战斗对于我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虽然它没有持续多久,但它是无情的、残酷的。敌方烧毁了两辆装甲车。躺在草丛中,我清楚地听到车里被活活烧死的战士们的喊叫声。不久前,在空降行动之前,我还帮助他们装车呢。又过了半小时,枪声渐远并归于平静。我们明白,那些向我们英勇进攻的残匪终于撤退了。又过了几分钟,浓雾在寂静中渐渐散去,我们中间的幸存者便悄悄地跑到浅沟的另一侧,不久前我们的

异教敌人曾与我们交火。当我们沿着坡面往沟上爬时,看见在雾中被我们打死的人,但很奇怪,为什么他们都穿着与我们同样的军装。只是又过了一阵子我们才知道,因为某种原因我们失去了朋友,而又英勇地冲锋并杀死自己人。原因是,地图上和计划上的命令搅混了,而别斯巴里奇科夫向我们口头传达的命令又在这突如其来的浓雾中搞错了。战争就是战争。雾就是雾。

不久我们接到休息的命令。我坐在灌木丛旁呕吐不止。这难以忍受的恶心是尸体散发的、开始时还很轻微的气息,以及对自己、对这场无耻的、不真实的,但又是真正的战争的蔑视而引发的。天空中传来了马达声。我抬起头。给我们增援的部队来了。

这时我摘下头盔,想要擦去额头上因为呕吐而渗出的汗水。子弹箱和降落伞劈头盖脸而来……到医院之前的一切我什么也不记得了……数字、数字、数字……甚至音乐也止息了。在这一切轰响之后,我的头脑中是一片无声的空白……又过了两昼夜,我彻底退役,主要原因与“外伤性丧失记忆”有关……

回到莫斯科后,我把双手放在脑后、双眼盯着天花板,和衣躺在沙发上整整一星期。奶奶对我的静卧状态表现出慈爱和理解。她的目光里隐藏着因我的归来而感到的幸福,甚至没想什么法子让我起床。后来,我突然明白了,必须立即设法找到一大笔钱。我首先决定去找达加也夫,目的在于重新回到弗拉基米尔·鲍里索维奇那里。可是,达加也夫因为运送毒品已经被剃了光头,在疯人院里关了很久。唯一去看望他的人是我们的化学教师斯维特兰娜·瓦连京诺

夫娜。至于弗拉基米尔·鲍里索维奇,听说,连同他的年轻的妻子,就是达加也夫的姐姐,都在不久前被人打死在“哈萨克斯坦”电影院的前厅里。发胖了的萨列冬,也可以说是变老了的萨列冬,仍然像先前那样不分白天黑夜地听音乐,我也就无法向他谈及自己的要求。瓦齐克·尤金永远是不能指望的,再说我也根本无法见到他——他去了上沃洛乔克,听说在瓦尔代城外的一个地方当了看林人。谢列加·缅尔基成功地在—一个旧草棚里开了一家私人作坊,我找到了他并由衷地拥抱并亲吻了我这位肮脏不堪的同学,他仍然是那样一个没指望的小人物。谢列加给了我 500 美元并让我直接去找“美臀”。他如今在切列姆什金市场做“营业部主管”。我没能立即找到他那华丽的、装饰着彩色玻璃的管理处,不知为何他的管理处设在脏乱不堪的市场院内。在衣帽间里我立即就发现了我记忆中如此珍惜的沾着他的鲜血的那件皮衣挂在衣架上。波戈杜洛夫自己在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这间房间里没有任何与商业或者同其他活动有关的特征。“美臀”坐在一台巨大的电视机的屏幕前,他正用遥控器在电视屏幕上玩游戏。他看见我后像孩子一样高兴,并按老规矩建议喝两杯,他还答应给我工作,在不久的将来我可以给他应有的份额,而这些钱对我足够了。

到了巴黎,我的心狂跳不已。首先我找到一家不很贵但很漂亮的旅馆,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房间不大,里面摆着几件旧家俱。有一扇带窗格的落地窗敞开着,窗外是一片小树林。透过小树林可以看见塞纳河。

我下楼到前台打了电话,然后立刻回房坐在床边等她的电话。窗外树林沙沙作响,黄昏渐近。我听见自己剧烈的心跳。

当她进来时,我甚至觉得自己的双腿被锯掉了。无论如何我站不起来,所以仍然坐着。她和我并排坐在床上,把双手放在屁股下面。我们就这样默默地坐了很久。

“如果这还有意义,”我终于嘶哑着嗓子开口说,“那么我来这里主要想对你说,我改主意了。别这样,莲娜,你暂时还是别嫁给他……”

“我也没打算嫁……”莲娜平静地回答,仍然没改变坐姿。

我们又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倾听着树叶的沙声。

“去把门锁上,我不说你就别转身……”莲娜求我。

我站起来,走到门边,轻轻地锁上门。

“极乐世界——是幸福之人的乐土……”我背对着她说。

“什么?”她问,也许没明白或者没听清。

“我说,我明白了,极乐世界——这是幸福之人的乐土……”

“伊凡。”过了一会儿她叫我,而我觉得这段时间出奇地漫长。我转过身。

她裸身站在窗旁,面对着我。虽然她身披轻盈的晚霞,但仍然显得苍白无光,我又一次觉得她像是被人用玻璃轻轻吹就的。

“也许你会冻坏的,”我对她说,“你冻坏了……但是,我对你有什么用?……”

“因为你漂亮,”莲娜想了想回答,“你比阿兰·德隆还漂亮。你不爱说话,聪明,强劲,你能战胜一切,承受一切。关于你自己,你还是像从前一样,什么也不知道,而我了解你的一切……”

我盯着她,站在锁上的门旁,连动一下的力气都没有。我惊呆了,仿佛初次见到她。

“到我这儿来,”她呼唤我,我迟疑片刻,



还是走到她面前。我把双手放在身后,低下头吻她的肩头。她那凉爽的手臂搂着我的头,在她的手臂的压力下我已无法把头从她的肩部抬起。我记得,她的背后是窗。窗外仍然有那棵老树的树叶沙沙作响,而在树后,一条古老的河在晚霞下流淌。在这一时刻我多么想了解并且相信这生命中真实的一切。我们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蓝天

金色的房间,银色的屋顶。大市场。巴黎。

莲娜披着婚纱,我无法看清她的脸,但我清楚地看见了她的微笑。我身着燕尾服、佩着白领结。餐厅乐队在演奏,餐厅歌手在歌唱,银色的天空中不断地有米粒或者糖果撒向我们。餐厅里人满为患。

“苦啊^①!”卡拉谢夫首先用俄语喊道。在这儿他身着民警服,用手枪向空中射击。法国侍者吓坏了,但乐队却表现出特别的庄

重。我们接吻。这一吻很久,而且确实有些苦味。我环顾四周——

这里有:佩着红领巾,头戴草帽的谢列加·缅尔基、穿着皮衣的“美臀”。我看见剃着光头的达加也夫在角落里,他的后脑勺上被人用化学铅笔写上了“№ 64”;达加也夫穿着精神病患者用的拘束衣,他脸对着墙角,不愿朝大厅看。女化学教师手里拿着装满香槟的高脚酒杯站在他身旁。女化学教师终于让达加也夫面对我们了。他喝了一口女化学教师递到他唇边的香槟,朝我们微微一笑。这里有萨列冬和他爸爸,还有莲娜的法国未婚夫——那位化妆品商人。出人意料,他也显得很幸福,至少他还很高兴地和着乐队弹起了巴拉莱卡琴^②。奶奶和着

① 俄国人举行婚礼时,来宾要求新夫妇接吻,便喊“苦啊!”——译者

② 巴拉莱卡琴系俄罗斯民间一种三弦的三角琴。——译者

乐队吹起了长笛。我走到她跟前,很小心地从她唇边取下了长笛,并引领着她到金色大厅跳华尔兹。我俩同时看见站在角落的爷爷。他身着将军服,向我们行军礼,还微笑着向我们挥挥手。娜奇卡·苏波尔多娃站在另一个角落里。我向她挥挥手,示意她走过来。她微微一笑,在我们中间跳了一圈,又消失在参加婚礼的人群中。谢苗·谢苗诺维奇穿着便服坐在小桌旁的凳子上,在他的灰衬衫下隐现出空降服的花纹,他的手里有一

架手风琴。瓦齐克·尤金从怀里拿出两只白鸽,把它们抛向银色的屋顶。白鸽扇动着双翼,久久盘旋不愿离去……

我已经说过,来参加我们婚礼的人很多。生者与死者。善良的、无耻的、软弱的、强劲的、聪明的、愚蠢的……所有我生命中经历过的人们。今天,我向他们所有人表示感谢,为他们所有人高兴。因为他们所有的人都曾经——是我。

(完)

〔后记〕

所有人都不同程度地以自身的某一部分在世上实现所谓的“为大多数人接受的真理”。在这样的“真理概念”中有一种所谓的永恒的冲突——“父与子”。确实,对于“代沟”问题的存在视而不见是愚蠢的,然而同时也存在着相当有说服力的“二者必择其一”的“传承”问题。上述“冲突”毕竟有时会在糊涂父亲和傻瓜儿子的争吵中止息,但文化和文明仍然在前进,而且其前进的方向始终与直接的“冲突”截然相反:“冲突”之后便是“传承”。我之所以回忆起这一切,完全是从工作和生活角度考虑的。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在我的精力和才能所及的范围内,我始终力求或多或少地观照生动的、变化了的现实。另外,我认为,对我亲眼所见到的我那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身上所发生的一切,我基本上是理解的。然而,偶然间他给我讲述了一些他所亲历的中学生活中的故事,却让我惊叹不已。

他1980年入学,如期毕业。就是说,他进中学时是“十月革命者”,毕业时自然是“市场民主派”。正如你们了解的那样,无论他成为前者还是后者,都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也不是他的过错。无论对他还是对他的同龄朋友们,我们都曾不屑一问便以自己的意志把他们盲目地一推了之,不管他们去向何方。后来,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又被派往车臣作战,目的在于用他们的年轻的生命抵偿我们对历史的不负责的态度,以及因某些人的糊涂想法所造成的后果。

听了这些故事之后,我起先建议儿子写“回忆录”。这确实可以成为一本很有意思的书——25岁的人写回忆录。他原已动笔了,但我看了几页后就明白:这是一个电影剧本的雏形。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当儿子开始“回忆”时,他下意识地用第一人称写作,而我们写剧本时当然就不用“我”而用“格罗莫夫说”或者“格罗莫夫走进来”等等。然而,在这篇以第三人称叙述的很有文化和专业水平的历史记录里,有某种重要的、也许是主要的东西消失了。于是我们又回到第一人称

“我”，现在一切都回来了。这几乎是个很浪漫的故事。就这样偶然又必然地形成了这个“电影小说”。

尼基塔·米哈尔科夫同样是偶然地看到了这个剧本，当时我并不知道这部“小说”的命运如何。我在8月的某个星期二给了他剧本，而第二天一早，8月的某个星期三，我们已经坐在他的“三T”公司里讨论该片的工作计划了。他立即从他公司的预备金中拨款让我们一天也不用等待地开始工作，不足的资金以后再找。

这种情况在今天是罕见的。感谢“三T”公司专业化的、准确的服务。影片已经拍摄完成。完成片当然与这里刊载的有所不同。但我们决定不作修改就发表。让它像开始时那样出现吧。

这是悲剧性的一代人。他们这一代的一部分人已经被社会幻想的毁灭、残酷的战争和毒品伤害得遍体鳞伤；但他们同样也是“活过来”的一代，在与污秽的社会现实作内心斗争时，他们善于隐秘地、下意识地保存作为人的尊严和自身的纯洁性，保存对始终孤独的、反社会的人的心灵的怀念、保存对于真正生活的信念。在这真正的生活里，人有成为自我的自由——爱和被爱。

在这方面，我与他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冲突。(C 索洛维约夫)

·简讯·

迪诺·里西获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奖

第59届威尼斯电影节颁发了开幕以来的第一座金狮奖终身成就奖。奖杯授予了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90岁高龄的迪诺·里西。威尼斯电影节主席亲自把奖杯递到了迪诺·里西的手里，并称颂迪诺·里西为意大利电影的繁荣和振兴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获此奖当之无愧。迪诺·里西1912年出生在米兰。1952年，迪诺导演了处女作——一部儿童影片。4年以后，他导演的《贫穷但是漂亮的男人们》在意大利电影界乃至国际影坛造成轰动，被定义为“粉红色的新现实主义”。20世纪70年代后期，迪诺开始探索拍摄新的题材，他渐渐偏重于有特点的文学作品，深刻描写人性、反对战争。

(理 编)